

山川原委，皆可案圖以稽 ——清聖祖考辨〈禹貢〉山川示例

簡承禾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皇輿全覽圖，朕費三十餘年心力，始得告成，
山脈水道，俱與禹貢相合。

清聖祖 康熙五十八年

本文之撰寫，是筆者就讀碩士班時，受東吳大學中文系陳恆嵩教授之啓發。撰寫過程中，滿、蒙文的問題，多承臺北大學歷史系主任林士鉉教授解答。文末附錄之輿圖，乃由劉珮琪女士襄助。同時亦感謝兩位匿名審查者及決審委員提供之意見，皆有裨於筆者對〈禹貢〉的思索。唯文中錯誤處仍由筆者負責。關於題目之擬設，稍作說明。李振興曰：「〈禹貢〉，本為《尚書》中的一篇，就內容說，不僅涵蓋了我國古代的政治疆域，同時對於這個疆域中的山山水水、土壤貢賦，也有極明確的記載。」李氏將〈禹貢〉內容分為「九州敷土」、「九州山水」、「治平措施」及「地平天成」四部分加以介紹，但是仔細閱讀內容，主要集中於「九州」與「山水」兩部分；九州之分與山水走向，密不可分，唯為方便解說，故將「九州」與「山水」分而論之。其實，早在胡渭(1633-1714)所撰〈略例〉，介紹自己的《禹貢錐指》，便大致區分為「導水」與「九州疆界」兩方面：自「導水九章，唯黑水原委，杳無蹤跡」至「事訖於明，故時務缺焉」，所論為「導水」；自「九州之疆界，《爾雅》、〈職方〉不同於〈禹貢〉」迄「若牽合前後，則反多窒礙矣」，則論「九州疆界」。接著「地域之分，以高山大川為限」云云，則總論「疆界」與「山水」之間的關係。是知「九州」與「山水」在論述上，可分可合。據清聖祖(玄燁，1654-1722，在位年1661-1722)論述〈禹貢〉的文獻來看，多偏重山水；其藉探討山脈水道，以彰政權對九州之域的掌控。再者，聖祖論〈禹貢〉不完全是出於學術興趣，主要是基於統治上的需求，所以不會就〈禹貢〉全文逐一梳理。因此本文集中於文獻足徵的「山水」，並在主標題上彰顯其旨。以上引述，分見李振興：〈禹貢山水〉，《孔孟學報》第48期(1984年9月)，頁57、59-92。〔清〕胡渭著，鄒逸麟整理：〈禹貢錐指略例〉，《禹貢錐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頁9-15。

一、前言

〈禹貢〉之義，據《書序》所云，乃大禹治水後，將天下分爲九州，並依土地而制貢賦¹。可見〈禹貢〉不僅論山水，與政治也有很大關係，因而受到統治者和學者的重視。像是漢代平當(?-4 B.C.)「以經明〈禹貢〉，使行河」²。後漢獻帝(劉協, 181-234)於天下混亂之際，模仿〈禹貢〉九州，置天下州郡³。晉、唐之際，則有裴秀(224-271)、賈耽(730-805)等人繪製地圖來表現〈禹貢〉。宋代以後，學者針對〈禹貢〉山川，進一步著書討論，並繪製地圖以明之。元、明兩代，繼承宋儒治〈禹貢〉的成果而發展，及至清初胡渭著《禹貢錐指》，集先儒之大成⁴，「於九州分域、山水脈絡，古今同異之故，一一討論詳明」⁵。胡渭之後，仍有不少研究〈禹貢〉的成果，其中值得注意者，是清聖祖對〈禹貢〉的討論。

聖祖在晚年時回憶：「朕於地理，從幼留心，凡古今山川名號，無論邊徼遐荒，必詳考圖籍，廣詢方言，務得其正。」⁶道出畢生對地理的考察活動。聖祖早年的地理學習，是從〈禹貢〉入手，內容呈現在《日講書經解義》(以下稱

¹ 題〔漢〕孔安國注，〔唐〕孔穎達疏：《尚書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2007年影印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卷6〈禹貢〉，頁1a。

² 〔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卷71〈平當傳〉，頁3050。

³ 〔南朝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卷9〈孝獻帝〉，頁387。〈禹貢〉九州分別爲：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獻帝模仿〈禹貢〉，唯將梁州改爲益州。

⁴ 劉起鈞：《尚書學史》訂補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6章〈魏晉至唐的《尚書》——僞古文出佔《尚書》正統〉，頁174、219；第7章〈宋學對《尚書》學的發展與疑辨〉，頁264-266、322-326；第8章〈清代對《尚書》的考辨研究〉，頁402-404。胡渭著，鄒逸麟整理：〈前言〉，《禹貢錐指》，頁5。

⁵ 〔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影印武英殿本)，卷12經部，頁34b「禹貢錐指」條。

⁶ 〔清〕馬齊等監修：《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臺北：華聯出版事業公司，1964年)，卷290，頁4a「五十九年十一月辛巳」條。〔清〕世宗敕編：《聖祖仁皇帝聖訓》(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11冊)，卷52〈廣幅員〉，頁7a「(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辛巳」條。由於下文討論地理山川之名號，涉及滿文等邊疆民族語的翻譯，文獻記載譯音互有出入、名號詳略互有差異，同時爲求本文體例一致，故凡出於聖祖的文獻，盡可能將《聖祖起居注》、《實錄》、《聖訓》或《聖祖文集》並列，以資比對，並且在必要時加以說明。

《書經解義》)。其後更長年關注並考察山川地理⁷，因而陸續針對〈禹貢〉中的河源、江源、三危等山川問題，撰文討論。聖祖之於〈禹貢〉的關注，可分為兩個階段：早期討論〈禹貢〉，大抵根據行政位置來判斷，晚年則就〈皇輿全覽圖〉以稽考。因此，聖祖對〈禹貢〉山水的分析，往往異於前人而有新的發揮。

劉起鈞(1917-2012)於《尚書學史》中，介紹清代較優異的〈禹貢〉著作數十家，又根據《清人文集篇目分類索引》指出清儒專篇討論〈禹貢〉共有一五六篇⁸，足見清代治〈禹貢〉之盛，但是忽略聖祖對〈禹貢〉的觀點。聖祖貴為帝王，孜孜於〈禹貢〉之考辨，其成果當值得留心。因此本文分析聖祖考辨〈禹貢〉山水的成果，並試著為聖祖考辨〈禹貢〉的意義提出解釋⁹。

二、清聖祖早年考辨〈禹貢〉分析¹⁰

聖祖親政後的經史學習，分為兩個部分：公開的日講和私下的南書房講讀。

⁷ 聖祖固然不以帝王之尊，親至田野考察，但是耗費三十餘年，派遣人員詳考山川地理，主持繪製〈皇輿全覽圖〉，而且自言：「遣使臣至崑崙西番諸處，凡大江、黃河、黑水、金沙、瀾滄諸水發源之地，皆目擊詳求，載入輿圖。」足見聖祖於地理務實求真的態度，這樣的態度與方法，應可視為聖祖的「研究與考察」。聖祖之語，見馬齊等監修：《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卷290，頁4a「五十九年十一月辛巳」條。清世宗敕編：《聖祖仁皇帝聖訓》，卷52〈廣幅員〉，頁7a「(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辛巳」條。

⁸ 劉起鈞：《尚書學史》訂補修訂本，第8章〈清代對《尚書》的考辨研究〉，頁402-410。

⁹ 〈皇輿全覽圖〉的完成，使原本就關心地理的聖祖更積極檢討山水名號，其論遠超過〈禹貢〉所載。本文僅從聖祖討論的地理，擇出與〈禹貢〉相關者分析，至於其他，當另撰文為之。此外，雖然本文的討論，主要案〈皇輿全覽圖〉而索驥，並附上相關輿圖以為參照，但是重點不在輿圖本身，而是作為分析之根據。〈皇輿全覽圖〉版本眾多，聖祖實際據何版本發論，難以稽考，故有數處不能完全對應，會在文中說明。〈皇輿全覽圖〉相關研究，下文引述中將會提及，此處不逐一羅列。至於清代輿圖介紹，可參林天人編撰：《皇輿搜覽——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明清輿圖》(臺北：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2013年)，及《方輿搜覽——大英圖書館所藏中文歷史地圖》(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5年)，二書收有乾、嘉以後全國輿地、分省等圖。

¹⁰ 所謂「清聖祖早年」者，是根據聖祖在南書房講讀與公開的經筵、日講來斷限。研究指出，聖祖於康熙十年(1671)開始舉行經筵，同年也開始日講。康熙十六年(1677)又設南書房，以為私下讀書的機構，可見聖祖求學之心甚熾。然而康熙二十五年(1686)，聖祖取消日講，經筵次數也逐步減少，甚至對經筵講官的態度有明顯轉變，從聆聽與討論，轉而訓誡與貶抑。這段約莫十五年的時間，講官向聖祖進講《四書》、《資治通鑑綱目》、《尚書》、《易經》與《詩經》；聖祖更私下在南書房，與儒臣討論經義與詩賦等，這些

聖祖不僅命儒臣透過日講課程，爲其講解經書義理，同時也希望揀選一、二儒臣，於萬機之暇，與之討論經義¹¹。根據研究，聖祖在親政以前，已經接受過相當程度的經史教育，對《尚書》內容毫不陌生¹²，故而在康熙十七年(1678)正月二十八日起，於南書房依序誦讀《尚書》；同年二月二十日，開始日講《尚書》的課程¹³。蓋〈禹貢〉多涉山川地理，在經義上較難發揮，所以沒有排入日講課程中¹⁴，但是聖祖在南書房誦讀至〈禹貢〉時，仍向侍讀張英(1637-1708)提

課程對掌握經學有相當大的助益。隨著聖祖漸趨成熟，對經筵、日講態度的轉變，實屬自然之理。所以此處謂「早年」者，乃指聖祖向儒臣學習、討論的階段，即康熙十年至二十五年(1671-1686)之間；其之於〈禹貢〉經義的汲取，也都集中在這段期間內。相較於早年汲汲於〈禹貢〉經義，則「晚年」者，指康熙四十年(1701)以後，分別派官員探勘黃河源頭，遣傳教士測繪地圖開始，終而完成〈皇輿全覽圖〉的這段期間，也是聖祖對照輿圖及〈禹貢〉而發論的時期。要精確指出早年與晚年的時段，固有其困難，此處唯爲說解方便而設。要之，聖祖早年著重於研讀〈禹貢〉經文，晚年則要求治下疆域與〈禹貢〉相合。具體論述，請詳本文第二、三節。至若經筵與日講等相關研究，見陳東：《清代經筵制度研究》（濟南：山東大學博士論文，2006年），第1章〈清代經筵制度沿革〉，頁16-20。拙著：《康熙日講書經解義研究》（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2年），第2章〈康熙朝經筵日講概述〉，頁24-26、34。

- 11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影印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本），第5冊，頁2369「十六年十月二十日癸亥」條。
- 12 拙著：《康熙日講書經解義研究》，第2章〈康熙朝經筵日講概述〉，頁22-24、27-30。
- 13 南書房講讀《尚書》與日講《尚書》，時間上幾乎一致，惟南書房講讀的進度比日講課程快一個月。南書房講讀的進度，見王淑編選：〈康熙十七年《南書房記注》〉，《歷史檔案》1995年第3期，頁3-18；〈康熙十八年《南書房記注》〉，《歷史檔案》1996年第2期，頁4-19；〈康熙十九年《南書房記注》（一）〉，《歷史檔案》1996年第3期，頁1-2。日講《尚書》的進度，見同前註，附錄〈康熙的尚書日講進程〉，頁167-175。
- 14 拙著：《康熙日講書經解義研究》，附錄〈康熙的尚書日講進程〉，頁175。講官沒有交代何以不講〈禹貢〉，但是根據四庫館臣評宋儒程大昌(1123-1195)《禹貢論》則可推知原因，其曰：「夫帝王之學與儒者異，大昌講《尚書》於經筵，不舉唐虞三代之法，以資啓沃，而徒炫博奧，此誠不解事理。」見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11經部，頁10a「禹貢論」條。帝王讀《尚書》，旨在吸取唐虞三代治國之法，而非孜孜於山川名號的考辨。蓋緣於此，所以講官未進講〈禹貢〉。雖然，講官依然編撰〈禹貢〉講義，並收入《書經解義》中。此外須說明者，〈禹貢〉雖然沒有排入日講中，講章仍進呈御覽。實際上，《書經解義》是以《書經直解》爲底本。該書是張居正(1525-1582)替明神宗（朱翊鈞，1563-1620，在位年1572-1620）編纂的講章。經比對，二書內容、文字多有符同。就〈禹貢〉來說，有明代的行政地名出現在《書經解義》中。但是不宜謂《書經解義》抄襲《書經直解》。據研究，聖祖與講官的討論內容會載入《書經解義》，加上要先進呈御覽，若聖祖有意調整，也必然反映在講章上。再仔細觀察，《書經解義·禹貢》並非全襲《書經直解·禹貢》，蓋聖祖御覽之後，授意調整。約言之，《書經解義》的內容調整與否，都有聖祖與講官之意在內，何況聖祖和張英於南書房討論在先，講章御覽在後。故下

出疑問與看法。《南書房記注》（康熙十七年四月）記載聖祖與張英討論歷來對「九河故道」說法不一的情況。聖祖以爲後代注經之所以言人人殊，主要原因在於後人沒有親見經文當時所載的山川地貌，只是根據典籍考證與推論，所以不僅不能昭合經文，更造成後人解讀的困擾。張英也勸諫聖祖，讀經不必惑於諸家注解，當就經文爲斷¹⁵。

聖祖君臣都認爲經書之所載，必有其道理，故群言淆亂折諸「經」，尤其〈禹貢〉所記載的是山水河川，有實地實物，儒者解經若不能實地勘驗，只是伏案稽考，終是「以意求之」，不能解決問題，故聖祖讀〈禹貢〉講究實地考察。《南書房記注》（康熙十七年四月）：

上召臣英至懋勤殿，上複誦「黑水西河惟雍州」十二節。戌時，上召臣英至懋勤殿。上複誦「荊河惟豫州」二十九節，親講「導岍及岐」四節，因論古雍州極西之地。上詳言邊外形勢，燦如指掌。因曰：「西北之地，古稱沙漠，向來人跡罕通，是以紀載所傳，多未詳確，今皆奉車書往來，故知之獨詳。大約甘肅之西，從長城外至四川松潘止，十餘日可達。導江雖始於岷山，其實江源尚在茂州之西，至岷山始大耳。黃河自積石北流，爲河套之地，至延安府入陝西境，其地亦不甚遠，今阿爾多斯固山之地即是也。」臣英對曰：「古所謂弱水流沙，皆傳聞荒忽，《書》、史所罕載。〈禹貢〉浮於積石，至於龍門。由此觀之，上古貢道且經河套而行。又〈禹貢〉所謂『析支渠搜』，皆在河套之內。此皆遐方遠域，今盡入版圖，益見本朝德威之所及者遠也。」¹⁶

聖祖研讀〈禹貢〉不像經生一般，排比經史文獻、逐句考辨，而是就統治的版圖證明，以求「徵考九州地勢，今古相參」¹⁷。根據聖祖所讀〈禹貢〉經文，依明、清的行政位置，整理如下：

(1) 〈禹貢〉「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書經解義》曰：「黑水，

文討論南書房君臣的對話，《書經解義》有參考之必要。並且爲瞭解《書經解義》與《書經直解》之間的關係，凡引《書經解義》處，亦附上《書經直解》，作爲參酌；若互有出入，將稍加論述。至於二書的詳細研究，見拙著：《康熙日講書經解義研究》，第2章〈康熙朝經筵日講概述〉，頁27-30；第3章〈日講書經解義的纂修及其相關問題〉，頁39、52-58。

¹⁵ 王澂編選：〈康熙十七年《南書房記注》〉，頁6「初五日」條。

¹⁶ 同前註，頁7「十五日」條。

¹⁷ 同前註，頁7「（四月）初十日」條。

水名，在今陝西肅州衛。」「雍州，即今陝西之地；弱水，在今甘州衛地。」¹⁸ 黑水在肅州衛，弱水在甘州衛地，明制皆屬陝西，隨著康熙二年(1663)分置陝、甘二省時，同劃入甘肅省¹⁹，雍州之地則包括當時的陝西與甘肅²⁰。雍州、黑水、弱水皆位在康熙時期的甘肅，《書經解義》以為位於陝西，是沿用舊稱²¹。雍州在〈禹貢〉中是最西的一州²²，「然雍州西、北二邊，世有戎翟之患」²³，因此聖祖讀〈禹貢〉雍州，詳論雍州極西之地，有展示統治疆域之廣的用意。

(2) 〈禹貢〉「岷山導江」。岷山，是大禹疏導江水的起點。《漢書·地理志》「蜀郡湔氐道」條載曰：「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²⁴ 酈道元(?-527)、孔穎達(574-648)、蔡沈(1167-1230)等人繼承此說²⁵。《書經解義》曰：「岷山，在今四川成都府茂州」，「岷山，江水源也」²⁶。岷山在四川茂州的東南，松潘的西北²⁷。雖然文獻上記載，認為江水出岷山，但是聖祖認為，長江發源於四川茂州之西，東南流經岷山後，匯為大江，故江水之源不止於岷山，而是江水

¹⁸ [清]庫勒納等奉敕編：《日講書經解義》(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影印清康熙十九年內府刻本)，卷3〈禹貢〉，頁22b、25a。[明]張居正：《書經直解》(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影印明萬曆元年經廠刻本)，卷3〈禹貢〉，頁30b-31a。

¹⁹ [清]高宗敕撰：《清朝通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卷94〈州郡五〉，頁2722「肅州」條、「甘州府」條。

²⁰ 《清史稿》：「陝西省，〈禹貢〉雍、梁二州之域。」「甘肅，〈禹貢〉雍州之域。」見趙爾巽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卷63〈陝西〉，頁2091「陝西省」條；卷64〈甘肅〉，頁2109「甘肅」條。

²¹ 《書經解義》當知〈禹貢〉雍州之地已屬甘肅，因為「甘肅省，明為陝西省之臨洮、鞏昌、平涼、慶陽四府；本朝康熙二年，分為甘肅省。」見清高宗敕撰：《清朝通典》，卷94〈州郡五〉，頁2721「甘肅省」條。將「甘肅」稱為「陝西」，乃是沿用《書經直解》之稱。

²² 李振興：〈禹貢山水〉，頁73。

²³ 胡渭著，鄒逸麟整理：《禹貢錐指》，卷10，頁299「黑水西河惟雍州」條。

²⁴ 班固著，顏師古注：《漢書》，卷28上〈地理志〉，頁1598。

²⁵ [北魏]酈道元注，陳橋驛校證：《水經注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卷33〈江水〉，頁765。題孔安國注，孔穎達疏：《尚書正義》，卷6〈禹貢〉，頁18b。[宋]蔡沈：《朱文公訂正門人蔡九峯書集傳》(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影印宋淳祐十年呂遇龍上饒郡學刻本)，卷2〈禹貢〉，頁14b。

²⁶ 庫勒納等奉敕編：《日講書經解義》，卷3〈禹貢〉，頁22b、35a。張居正：《書經直解》，卷3〈禹貢〉，頁27b、44b-45a。

²⁷ 趙爾巽等：《清史稿》，卷69〈四川〉，頁2233「茂州直隸州」條；頁2238「松潘直隸廳」條。

至岷山始大²⁸。

(3) 〈禹貢〉「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又「導河積石，至于龍門」。《書經解義》曰：「積石、龍門，二山名。積石，在今陝西河州衛西北；龍門，在今陝西西安府韓城縣東北。」²⁹ 積石在河州衛，康熙二年，劃入甘肅省³⁰。龍門在西安府，屬陝西省³¹。黃河是中原與外族的界河，在古人心目中，「大禹治河」或多或少有宣揚中原政權之意義，故胡渭言「禹導自積石為中國河，其水不復行戎翟之境」，然而現實並非如此！胡渭接著表示：自三代開始，雍州屢為戎翟侵略。秦、漢以降，河套地區成為中國與外族的緩衝地，黃河則在中國與外族之間「出且入者再」，所以歷代政權對河套地區的控制並不確實，導致「州縣舊蹟，置之不問矣。」³² 聖祖所謂的「阿爾多斯固山」乃指「鄂爾多斯旗」，是蒙古部族³³。明代嘉靖年間(1521-1567)，吉納部落移居於河套地區，遂有「鄂爾多斯」之名。皇太極天聰九年(1635)，武力所及，致使鄂爾多斯臣服於滿洲。順

²⁸ 雖然聖祖早年已知江水不出岷山，但是對於江源仍不確知，故未能詳辨。及至晚年因〈皇輿全覽圖〉完成，聖祖案圖稽考，始知江源所在。關於聖祖晚年論長江之源，詳後討論。

²⁹ 庫勒納等奉敕編：《日講書經解義》，卷3〈禹貢〉，頁27b-28a。張居正：《書經直解》，卷3〈禹貢〉，頁34b-35a。

³⁰ 此處要說明的是「積石」一名。孔穎達據《漢書·地理志》認為積石是山之名，後儒又紛亂其說，指稱在塞外為「大積石山」，塞內為「小積石山」。今人則以為是位在青海的積石山，又名大雪山，即古人所謂「大積石山」。見題孔安國注，孔穎達疏：《尚書正義》，卷6〈禹貢〉，頁21下。胡渭著，鄒逸麟整理：《禹貢錐指》，卷13上，頁409-411「導河積石至于龍門」條。屈萬里：《尚書集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年），〈禹貢〉，頁65。李振興：〈禹貢山水〉，頁75。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清時期》（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87年），〈青海〉，頁59-60，(⑥：13)-(⑦：14)。然而張英對曰：「〈禹貢〉浮於積石，至於龍門。由此觀之，上古貢道且經河套而行。」若黃河從青海積石山流出，至河套地區而行，恐怕太遠，而且《書經解義》指出，積石位在陝西河州衛西北，與青海積石山相距甚遠。從明清之際的行政變革來看，聖祖所謂「積石」，應是指康熙二年改隸甘肅西寧府河州西北處的「積石關」，因為黃河經積石關後，即往北流，進入西套地區。如此，張英的回覆方有意義。見清高宗敕撰：《清朝通典》，卷94〈州郡五〉，頁2721「蘭州府」條。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清時期》，〈甘肅〉，頁28-29，(⑨：13)。

³¹ 清高宗敕撰：《清朝通典》，卷94〈州郡〉，頁2721「西安府」條。

³² 胡渭著，鄒逸麟整理：《禹貢錐指》，卷13上，頁424「導河積石至于龍門」條。清代以前，歷代政權對於河套一帶的控制都非常薄弱，幾乎為邊疆政權所掌握，直到清代實施盟旗制度，才得以有效掌控河套地區。相關問題，見王天順：《河套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緒論·黃河與河套〉，緒論頁16-17；民族卷·第8章〈清朝和民國政府統治下的河套地區〉，頁365-372。

³³ 「固山」是從滿洲語音譯而來，滿語作 gūsa，意為八旗之「旗」。

治六年(1649)，鄂爾多斯七旗歸附清廷，於是策封鄂爾多斯諸郡王，授予「札薩克」一職³⁴。雖然清廷以羈縻政策控制蒙古族，但是相較於歷代完全無法控制河套地區而言，算是有效掌握該地區。既然已經歸附清廷，因此聖祖研讀〈禹貢〉時，便能清楚「黃河自積石北流」的地理實況。

張英的回覆³⁵，亦可以整理如下：

(1)「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書經解義》曰：「是紀禹之導水，而先序極西異常之水也。合黎，山名，在今陝西行都司西北，弱水環之。流沙，地名，在今肅州衛舊城之西。」³⁶合黎，位於明代陝西行都司境外，在鞏鞏境內，康熙二年屬甘肅省³⁷。流沙所在的肅州衛，即如上所述，康熙二年時，已屬甘肅省。大禹治水，從九州最西之處開始，首治弱水，使其主流入於合黎之山，其支流則導入流沙³⁸。弱水、流沙是極西之地，常為外族控制，政權所不及，史書的論述也就不詳細。

³⁴ 趙爾巽等：《清史稿》，卷77〈內蒙古〉，頁2417-2420「鄂爾多斯舊六旗，又增設一旗，共七旗」條。所謂「札薩克」是由滿語音譯而來，滿語作 *jasak*，即「旗籍清吏司」，設於外族各旗下，屬軍事單位。關於「札薩克」一職，《清史稿》僅於〈兵志〉稍敘述其職務，此外並無特別說明。見同上書，卷130〈八旗〉，頁3875-3876。

³⁵ 張英撰有《書經衷論》，四庫館臣曰：「前有康熙二十一年正月進書原序一篇。時英以翰林學士侍講，故因事敷陳，頗類宋人講義之體，其說多採錄舊文而參以新義。」《書經衷論·禹貢》凡十四條，但是相較《書經解義》的詳細解說，及在南書房與聖祖的對話，皆有不同，反而《書經解義》與南書房的對話較貼切。至於今人顧一凡，謂《書經衷論》與《書經解義》多暗合，因而推測張英獨力完成《書經解義》，斯亦過矣。固然張英曾擔任侍講，所以《書經衷論》內容有部分與《書經解義》相合，但是逕謂張英完成《書經解義》，此論恐是沒有考慮日講制度所致。康熙朝日講制度，詳前文注腳所引參考著作，茲不贅述。以上論述，分見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卷12經部，頁37a-b「書經衷論」條。〔清〕張英：《書經衷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8冊），卷2〈禹貢〉，頁1a-5b。顧一凡：〈同源異軌：日講書經解義與書經衷論考析〉，《北京社會科學》2021年第1期，頁55-64。

³⁶ 庫勒納等奉敕編：《日講書經解義》，卷3〈禹貢〉，頁32a-b。張居正：《書經直解》，卷3〈禹貢〉，頁40b、41a。

³⁷ 趙爾巽等：《清史稿》，卷64〈甘肅〉，頁2120「甘州府」條。

³⁸ 《書經解義》：「史臣曰：天地之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故導水亦必自西北始，弱水在雍西北，性又西流，故先順其性而導之。」《書經直解》：「弱水、黑水在西北極邊，與諸水不相干涉，故先記之。」分見庫勒納等奉敕編：《日講書經解義》，卷3〈禹貢〉，頁32b。張居正：《書經直解》，卷3〈禹貢〉，頁40b。《書經解義》認為〈禹貢〉之治水次序，是順水性而理，非《書經直解》「與諸水不相干涉」之謂，則講官之意較張居正深遠，可見《書經解義》不完全抄自《書經直解》。

(2)「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書經解義》曰：「是紀禹定雍州之田賦貢物及貢道。」又曰：「崑崙、析支、渠搜，三國皆西方之戎。」³⁹大禹將雍州河套地區治理完善後，便制貢賦及貢道，使西戎向中央納貢，顯示出「禹功所及之遠如此」⁴⁰。

綜合上述君臣對〈禹貢〉雍州的解讀，可以看出聖祖對西北地區的控制感到相當滿意，與前引胡渭所說「雍州西、北二邊，世有戎翟之患」，形成對比。張英的回答，不僅反映清朝國力，同時道出聖祖「德威之所及者遠」的心理。

聖祖讀〈禹貢〉，除討論古今地理外，也關注黃河泛濫與治理的方法，其曰：

從來言治河者，謂宜順其入海之性，不宜障塞以與之爭，此但言其理耳。今河決在七里溝，去海止四十餘里，若聽其順流入海，既可不勞人功，亦且永無河患，豈不甚便？但淮以北二百里之運道，遂成枯渠，國計所關，故不得不使其迂（迴）〔迴〕而入淮河之故道，此由時勢與古不同也。⁴¹

七里溝有兩處，一在陝西漢中府⁴²，一在江蘇徐州府⁴³。漢中的七里溝離出海口不止四十餘里，因此聖祖所指應是位於徐州的七里溝。黃河自古為河患之要，尤其靠近出海口時，因為地勢平坦，又與淮水互有侵奪，常有氾濫情形，

³⁹ 庫勒納等奉敕編：《日講書經解義》，卷3〈禹貢〉，頁27b、28a。張居正：《書經直解》，卷3〈禹貢〉，頁34a-35a。

⁴⁰ 庫勒納等奉敕編：《日講書經解義》，卷3〈禹貢〉，頁28b。《書經直解》：「這三國都在西番地面，總叫做西戎。」復曰：「舊志朔方郡有渠搜縣，未詳所在，大約在今寧夏河套之地。」又曰：「這三國本是西方戎落，今亦順服我中國之化，與三苗同其丕敘矣，禹功所及，其遠如此。」見張居正：《書經直解》，卷3〈禹貢〉，頁35a-b。崑崙、析支與渠搜，大致位在西北河套地區，屢有外族侵擾之憂。明朝自土木堡之變(1449)以後，軍事由盛轉弱，對河套的控制力也日趨於衰；正德五年(1510)河套邊患更劇，直到清朝入關統一後，才又重新掌控河套地區。雖然《書經解義》與《書經直解》都是講述《尚書》大義，但是衡諸兩朝的國際形勢，前者較具現實意義，後者則有勉勵之意。明清兩代對河套政權的消長，見王天順：《河套史》，民族卷·第7章〈元明時期河套地區的民族關係〉，頁345-356；第8章〈清朝和民國政府統治下的河套地區〉，頁361-365。

⁴¹ 王澂編選：《康熙十七年《南書房記注》》，頁7-8「(四月)十七日」條。

⁴² 趙爾巽等：《清史稿》，卷63〈陝西〉，頁2100「漢中府」條。

⁴³ [清]靳輔：《治河方略》（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影印清嘉慶四年刻本），〈黃河新險工圖〉，頁327。

而徐州爲河道最窄之處⁴⁴，於康熙十年至十二年之間(1671-1673)，河水在徐州的七里溝「屢塞屢決」；康熙十六年，治河官員上奏「河工壞潰」⁴⁵。所以聖祖認爲，雖然治河的原則在順水流之性，但是下游地區，黃、淮兩河息息相關，是「二瀆敵也，然黃強之時多，淮強之時少」，若一味使黃河順流入海，則淮河必定乾涸，沿岸農家也無從生存，因此治理黃河，要將淮河納入考量，最好的方式是「以黃濟淮，使強者不獨強，則二瀆交得其平，而會同之勢成」⁴⁶。聖祖所提的治河方式，不拘於經書，能審時度事，靈活運用。由斯可見，聖祖讀〈禹貢〉的方式，無論是西北之地，還是東邊的河水，皆不囿於前儒的考證成果，而是就所統治的領土加以對照、分析。其中固然有聖祖對自己武功的誇耀，卻也見其讀〈禹貢〉著重於現實用途。

聖祖除了於南書房講讀和日講外，也向傳教士學習西學，內容包括數學、歷算、天文與地理等知識⁴⁷。康熙二十年(1681)平定三藩之亂以後，聖祖東巡，並邀請傳教士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一同參與。南懷仁曰：「我也奉旨參加了這一遠征的行列，一路上陪侍著皇帝。我的任務其一是要用科學儀器觀察，並記載大氣和土地的情況，及所到之地的緯度、磁針差度，還有山的高度；其二是要回答皇帝陛下關於天文、氣象等問題的詢問。因此，我被安排在他的左右。」⁴⁸ 測量緯度、磁針與山的高度，以及回答天文等相關問題，是聖祖偕同南懷仁的主要原因，可見聖祖對西方地理學所用的測量技術，有相當地認識與信任。如果與聖祖在南書房討論〈禹貢〉相較來看，於書房中，聖祖僅能從各地官員的文書往來，以計算各地距離，然後指出古今地理變化；走出書房，聖祖積極運用所學，希望透過西方的測繪技術，丈量實際的地理位置。聖祖所以重視地理，與作戰有很大的關係。康熙二十三年(1684)，直隸巡撫格爾古德(?-1684)上呈直隸地圖，聖祖閱畢後，曰：

朕覽直隸地圖，城池方向、河道源流及道里遠近，舛錯不符之處甚多。別

⁴⁴ 同前註，卷2〈黃淮交濟〉，頁23a-b。

⁴⁵ 趙爾巽等：《清史稿》，卷126〈黃河〉，頁3719-3720；卷279〈崔維雅〉，頁10114。

⁴⁶ 靳輔：《治河方略》，卷2〈黃淮交濟〉，頁23a。

⁴⁷ 陳詩雯：《十七世紀中西知識體系的相遇——以康熙皇帝爲中心的探討》（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10年），第3章〈康熙皇帝宮廷中的西方學術〉，頁39-56。

⁴⁸ 南懷仁：《韃靼旅行記》，收入白晉著，徐志敏、路洋譯：《老老外眼中的康熙大帝》（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08年），頁58。

省或不悉知，如直隸地方豈有未悉者乎？地圖緊要，必精確詳明，形勢符合，方可稱善。不然，何如不繪為愈耶！至豫省兩府繪圖亦不詳明。自用兵以來，備覽地圖，相度形勢，調遣將士，甚為有益。⁴⁹

由於地理環境改變，以致地圖不符現實。也或許中國傳統測繪地圖的方式，難以精確掌握與呈現地貌，因而巡撫所呈的地圖錯誤百出。聖祖從戰爭中體會到地圖的重要性，因此要求「九卿會同詳看，及各省地圖作何察核，務令真確，勿蹈從前虛文，一併確議具奏」⁵⁰。之後官員具奏的內容與改善方式，文獻中不可見得，但是可以確知的是，其他地區的測繪也有「舛錯不符」的現象。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俄因邊界的事而起紛爭，傳教士張誠(Jean-François Gerbillon, 1654-1707)打開亞洲地圖，「韃靼地區在地圖上簡略不詳，標繪粗漏」⁵¹，地界標示不明，國土損失就難以察覺。因此聖祖逐漸萌生測繪地圖的想法，這引發其晚年對〈禹貢〉及輿圖的興趣，進而遣人實地踏查。

整體而言，聖祖早年〈禹貢〉的學習，主要集中於南書房講讀及日講課堂上，君臣根據地理實況討論〈禹貢〉經義。此外，不能忽略西方傳教士測繪地圖的技術，他們取得聖祖的信任，使聖祖自覺輿圖如實反映地理的重要性，最終開啓聖祖晚年積極於〈禹貢〉地理的工作。

三、清聖祖晚年考辨〈禹貢〉分析

上文提到，聖祖所以重視地理，主要是戰事的關係。西方傳教士測繪的地圖較為精密，有助提高戰場兵力之布局，所以聖祖用兵噶爾丹時，也偕同傳教士赴戰線，負責測量經緯度。康熙四十七年(1708)，聖祖開始要求傳教士大範圍測量地理，至康熙五十七年(1718)，終於完成第一幅以經緯度座標的〈皇輿全覽圖〉⁵²。康熙五十八年(1719)，聖祖諭內閣學士蔣廷錫(1669-1732)，曰：

⁴⁹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北京所藏），第16冊，頁7797-7798「三月十二日戊寅」條。

⁵⁰ 同前註，頁7799「（二十三年）三月十二日戊寅」條。

⁵¹ 張誠著，陳霞飛譯：《張誠日記》（北京：商務印書館，1973年），頁91「1690年1月26日」條。

⁵² 吳伯姪：《康雍乾三帝與西學東漸》（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5章〈吸納與排拒：康乾二帝對西方科學的態度〉，頁392-401。

〈皇輿全覽圖〉，朕費三十餘年心力，始得告成，山脈水道，俱與〈禹貢〉相合。爾將此全圖，並分省之圖，與九卿細看。倘有不合之處，九卿有知者，即便指出，看過後面奏。⁵³

康熙五十九年(1720)，聖祖又曰：

今大兵得藏，邊外諸番，悉心歸化，三藏阿里之地，俱入版圖，其山川名號，番漢異同，當於此時考證明核，庶可傳信於後。⁵⁴

康熙五十八年起，清廷藉平定戰亂，進一步控制西藏政權⁵⁵，因此測繪西藏且修改〈皇輿全覽圖〉。根據研究，〈皇輿全覽圖〉主要有三種版本：第一版於康熙五十六年(1718)出版，木刻，有二十八幀地圖；第二版於康熙五十八年出版，手繪，有三十二幀地圖，後來由意大利傳教士馬國賢(Matteo Ripa, 1682-1745)攜至歐洲，製成銅版四十一幀圖；第三版於康熙六十年(1721)出版，木刻，有三十二幀地圖。主要差異在於西藏的地圖愈加詳細⁵⁶。〈皇輿全覽圖〉繪編後，聖祖即根據地圖，發表不少關於〈禹貢〉的論點。下文分為黃河、長江之源、黑水與三危，共三個主題討論，以見聖祖對〈禹貢〉的見解。

(一) 黃河之源

〈禹貢〉：「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就經書而言，大禹從積石山開始疏導黃河，沒有明指黃河源於積石山。《山海經》曰：「海內昆侖之虛……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勃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⁵⁷黃河源於崑崙山，經過積石山，《爾雅》同樣記載「河出崑崙虛」⁵⁸，已佚的《禹本紀》也認為「河出崑崙」。先秦典籍幾乎認為黃河源自崑崙山，然而此說

⁵³ 馬齊等監修：《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卷283，頁10b「二月乙卯」條。清世宗敕編：《聖祖仁皇帝聖訓》，卷5〈聖學〉，頁30a「己亥二月乙卯」條。

⁵⁴ 馬齊等監修：《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卷290，頁4a「十一月辛巳」條。清世宗敕編：《聖祖仁皇帝聖訓》，卷52〈廣幅員〉，頁7a「十一月辛巳」條。

⁵⁵ 趙爾巽等：《清史稿》，卷8〈聖祖本紀〉，頁297、299、301。

⁵⁶ 方豪：《中西交通史》(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3年)，第4篇第7章〈地理學〉，頁868。吳伯姪：《康雍乾三帝與西學東漸》，第5章〈吸納與排拒：康乾二帝對西方科學的態度〉，頁402。至於本文所使用的地圖，將於下文討論時，一併交代。

⁵⁷ [晉]郭璞注，[清]畢沅校：《山海經》，收入《二十二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卷11〈海內西經〉，頁1374-1375。

⁵⁸ 郭璞注，[宋]邢昺疏：《爾雅注疏》(《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卷7〈釋水〉，頁23b。

引起司馬遷(145-86 B.C.)懷疑，以為討論河源當從〈禹貢〉爲是⁵⁹。《漢書》則有更明確的記載：

其河有兩原：一出蔥嶺山，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云。⁶⁰

《漢書》根據武帝與西域交通的記錄載入。由於中西交通往來，黃河源頭逐漸爲人所知。班固不言黃河出於崑崙山，亦非出於積石山，而是認爲有兩個源頭：一出蔥嶺山，一出于闐，同注入蒲昌海，南流經過積石山後，始稱爲中國的黃河。或許隨著交通的頻繁，發現積石以西仍有水源源而來，因此《漢書》論黃河不拘於〈禹貢〉而欲探其源。至於《山海經》、《爾雅》「河出崑崙」之說，較《漢書》所載更西推遠，並且逐漸爲後人接受。雖然如此，對於經書的「導河積石」仍要有一個合理解釋，《尚書正義》(以下稱《正義》)注解「導河積石」一節，曰：

河源不始於此，記其施功處耳，故言施功發于積石。

《釋水》云：「河出崑崙虛，色白。」……郭璞云：「發源高處，激湍，故水色白；潛流地中，受渠眾多渾濁，故水色黃。」⁶¹

說蓋主《山海經》，認爲黃河源於中國境外，流入積石後，始是大禹治河之處。至於河源，則宗《爾雅》之說，並引郭璞注解，反駁《漢書·西域傳》的說法⁶²。唐朝長慶年間(821-824)劉元鼎(生卒年不詳)出使吐蕃，也曾探察河源，其紀錄爲宋代蔡沈所肯定，《書集傳》曰：

⁵⁹ 司馬遷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所謂「禹本紀」，非指《史記》中的「禹本紀」，據注家所考，應是一本已佚之書。司馬遷又曰：「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可知其對「河出崑崙」之說是趨於否定的態度。見〔漢〕司馬遷著，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年)，卷123〈大宛列傳〉，頁43-46。

⁶⁰ 班固著，顏師古注：《漢書》，卷96上〈西域傳〉，頁3871。

⁶¹ 題孔安國注，孔穎達疏：《尚書正義》，卷6〈禹貢〉，頁25a。

⁶² 《正義》駁鄭玄(127-200)釋「導」意，云：「自河出崑崙，發源甚遠，豈至積石猶未成流而云導河也！」則知其主張河出崑崙，故針對《漢書·西域傳》：「河有兩源，一出蔥嶺，一出于闐」云云，引郭璞(276-324)語：「其去崑崙里數遠近，未得詳也。」有否定《漢書》記載之意。見題孔安國注，孔穎達疏：《尚書正義》，卷6〈禹貢〉，頁24b、25a。

今按：《漢·西域傳》，張騫所窮河源，云有兩源：一出蔥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潛行地中，南出積石。又，唐長慶中，薛元鼎使吐蕃，自隴西成紀縣西南出塞二千餘里，得河源於莫賀延積尾，曰悶磨黎山。其山中高四下，所謂崑崙也。東北流與積石河相連，河源澄瑩，冬、春可涉，下稍合流，色赤；益遠，他水并注，遂濁。吐蕃亦自言崑崙在其國西南。二說恐薛氏爲是。⁶³

蔡沈根據劉元鼎的探勘，認爲河源出於崑崙，非《漢書》所說的蔥嶺和于闐。並且認爲崑崙位在吐蕃的西南方，而非西域⁶⁴。至於爲何取劉元鼎而捨張騫(?-114 B.C.)，蔡沈沒有說明理由，很有可能認爲時代愈近世，所推更遠，而且揆諸常理，河源必遠，才能成其爲大河也。

元朝統有的疆域爲中國歷代之最，因此有機會更深入調查黃河源頭。至元十七年(1280)，招討史都實(-1280-)探河源，指出河源非如《漢書·西域傳》所云，一出蔥嶺山，一出于闐；亦非唐人劉元鼎所說，河出崑崙⁶⁵。其曰：

按：河源在土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渙，弗可逼視，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燦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羣流奔轅，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而東，連屬吞噬，行一日，迤邐東驚成川，號赤賓河。又二、三日，水西南來，名亦里出，與赤賓河合。又三、四日，水南來，名忽闌。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朶，合流入赤賓，其流浸大，始名黃河，然水猶清，人可涉。⁶⁶

都實指出，黃河源頭有許多泉水，分散在各處。衆多泉水在日月折射下，從高處俯瞰，猶如星星一般，蒙古語曰「火敦」，蒙古語作 odon；所謂「腦兒」，

⁶³ 蔡沈：《朱文公訂正門人蔡九峯書集傳》，卷2〈禹貢〉，頁22b。薛元鼎應作劉元鼎。見胡渭著，鄒逸麟整理：《禹貢錐指》，卷13上〈附論河源〉，頁434。

⁶⁴ 《漢書·西域傳》所載的「河有二源」之說，後人並不採信，而以爲河出崑崙，但是崑崙位在中國的西北方還是西南方，屢有爭議。關於此，詳後討論。

⁶⁵ 〈河源附錄〉：「河源古無所見。〈禹貢〉導河，止自積石；漢使張騫持節，道西域，度玉門，見二水交流，發蔥嶺，趨于闐，匯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唐薛元鼎使吐蕃，訪河源，得之於悶磨黎山。然皆歷歲月，涉艱難，而所得不過如此。世之論河源者，又皆推本二家，其說怪迂，總其實，皆非本真。」雖然肯定漢、唐使節窮河源的努力，而且影響後世甚鉅，但是無論採取哪一種說法，對黃河源頭的認識都不正確。見〔明〕宋濂等：《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卷63〈地理〉，頁1563。

⁶⁶ 同前註，頁1564。

蒙古語作 nagur，是湖泊、大澤的意思⁶⁷。諸多泉水匯聚成兩大澤，名為「阿刺」，蒙古語作 alak nagur，即五顏六色的湖泊之意。其水往東流，名為赤賓河，「益引而東」，經兩、三百里之後，始名為黃河⁶⁸。

明洪武十一年(1378)，僧人釋宗泐(?-1391)奉太祖(朱元璋，1328-1398，在位年 1368-1398)之命，前往西域求取佛經；洪武十五年(1382)，回程時路經河源，遂撰有〈望河源〉⁶⁹，其序曰：

河源出自抹必力赤巴山，番人呼黃河為扶處，犛牛河為必力處。赤巴者，分界也。其山西南所出之水，則流入犛牛河，東北之水是為河源。……其源東抵崑崙可七、八百里，今所涉處尚三百餘里，下與崑崙之水合流中國。相傳以為源自崑崙，非也。⁷⁰

宗泐指出黃河之源出於抹必力赤巴山，即巴顏喀拉山，山水往西南流是為長江；自東北出是為黃河，故巴顏喀拉山是黃河與長江的分水嶺⁷¹。黃河自巴顏喀拉山東流後，約七、八百里與崑崙山之水匯流入中國，所以宗泐認為崑崙山非河源，而是更西邊的巴顏喀拉山。

據上所述，歷代關於河源的記載，有幾種說法：河出積石山，或崑崙山，或火敦腦兒，或抹必力赤巴山，莫衷一是。入清以後，胡渭整理前人之說，逐一辨證，力主無論黃河出於何處，必然要經過積石山，過積石山以後方為中國河，故積石山可視為黃河之源，胡渭並以此而懷疑歷史上探勘者目睹河源的真實性⁷²。

⁶⁷ 朱思本曰：「水從地涌出如井，其井百餘，東北流百餘里，匯為大澤，曰火敦腦兒。」見同前註。單就蒙古語的意思來說，「火敦」是星星之意，「腦兒」是湖泊的意思，即猶如星星眾多的湖泊，史籍稱為「星宿海」。

⁶⁸ [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臺北：新興書局，1972年影印清光緒己卯刻本），卷125〈川瀆二〉，頁2a。

⁶⁹ 賴振寅：〈讀宗泐望河源并序〉，《文史知識》2006年第2期，頁38-39。

⁷⁰ 胡渭稱此詩在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中，然而翻檢該書，以及宗泐所撰的《全室外集》，並無〈望河源〉一詩。故此處轉引自胡渭著，鄒逸麟整理：《禹貢錐指》，卷13上〈附論河源〉，頁437。

⁷¹ 賴振寅：〈讀宗泐望河源并序〉，頁39。

⁷² 胡渭已預設河出積石，其曰：「今人說河源，動輒引崑崙以證，是何其好學深思不逮子長遠甚，而愛奇獨過之也。」司馬遷對於河出崑崙是持懷疑的態度，故依循〈禹貢〉「導河積石」為說，胡渭批評後人動輒以為崑崙為河源，是出於好奇的心理。又據王鏊(1450-1524)〈河源辨〉而曰：「文恪以都實所謂崑崙，未必真崑崙；所謂星宿海，未必真河源，不可以一夫之目，廢千古之論。此言是也。」其堅信經史之說如此。最後又曰：「使積石之地，果有重源顯發之迹，則《漢》、《史》為是，《元史》為非。苟無其迹，而

相較於伏案的學者，聖祖著重於「腳到」與「眼到」。就文獻所見，康熙二十四至二十五年(1685-1686)之間，聖祖首次發表對於河源的看法，其曰：「漢之張騫，唐之蔡元鼎所訪河源，皆不過玉門關外，紀載寥寥。元之都實，遠履發源之地，紀其分流伏脉，歷歷可指，較之往代，相去懸絕。」⁷³ 聖祖認同都實探勘的河源較前代更有突破性。康熙四十三年(1704)初夏，聖祖遣拉錫(?-1726)等人探勘河源，並論曰：

黃河之源，雖名古爾班索羅謨，其實發源之處，從來無人到過。爾等務須直窮其源，明白察視其河流至何處入雪山邊內，凡經流等處，宜詳閱之。⁷⁴

拉錫等回奏曰：

六月初七日，至星宿海之東，有澤名鄂陵，周圍二百餘里。初八日，至鄂陵西，又有澤名札陵，周圍三百餘里。鄂陵之西，札陵之東，相隔三十里。初九日，至星宿海，蒙古名鄂敦塔拉。登山之至高者視之，星宿海之源，小泉萬億，不可勝數。周圍羣山，蒙古名為庫爾滾，即崑崙也。……古爾班吐爾哈山下諸泉，西番國名為噶爾馬塘；巴爾布哈山下諸泉，名為噶爾馬春穆朗；阿克塔因七奇山下諸泉，名為噶爾馬沁尼。三山之泉，流出三支河，即古爾班索羅謨也。三河東流，入札陵澤，自札陵澤一支，流入鄂陵澤；自鄂陵流出，乃黃河也。除此，他山之泉與平地之泉，流為小河者，不可勝數，盡歸黃河東下。⁷⁵

拉錫等人指出的星宿海，即元朝都實所謂「火敦腦兒」，清朝時期則謂之「鄂敦

唯西南一大川，自吐蕃來數千里，與積石之河相連，則亦不可謂非河源矣。」《史》、《漢》所載的河源出於西域的積石，兩《唐書》則載出於吐蕃的積石；前者在西北，後者在西南，胡渭以為，「欲辨二源之是非，其樞要全在於積石」。「積石」是西北的山名？抑是西南的水名？非其所措意者，重要的是須符合導河必由「積石」的經文。以上引文，依序見胡渭著，鄒逸麟整理：《禹貢錙指》，卷13上〈附論河源〉，頁427、438、440、439。

⁷³ 蔡元鼎應作劉元鼎。此為聖祖讀《資治通鑑》所論斷之語，於康熙二十九年收入於《起居注》中。見庫勒納等：《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9年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第1冊，頁163、237-238「三月二十九日」條。

⁷⁴ 馬齊等監修：《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卷217，頁10b「九月丁卯」條。

⁷⁵ 同前註，頁11a-b「九月丁卯」條。

搭拉」，蒙古語作 *odon tal-a*⁷⁶，讀音不同，實指一也⁷⁷。雖然聖祖認同都實的探勘紀錄，仍然遣拉錫等人實地勘察。探勘隊首先抵達鄂陵湖，持續往西走三十里，便到達札陵湖；越過札陵湖再向西行，才來到星宿海。星宿海之處有群山，是為崑崙山；以崑崙山為中心，從南順時鐘方向，分別有古爾班吐爾哈山等五座高山⁷⁸，其中古爾班吐爾哈山、巴爾布哈山、阿克塔因七奇山，這三座山的山腳下，形成許多泉水，泉水形成三條河流，即聖祖與拉錫所謂的「古爾班索羅謨」，蒙古語作 *gurban solaman gool*⁷⁹，意為三個水岔。三河皆東注札陵湖，札陵湖再流出一河，東入鄂陵湖，由鄂陵湖流出即是黃河。相較於元代都實指出的「二巨澤」，拉錫等人實際道出札陵、鄂陵二湖之名。前人說法，只是大略道出黃河源於星宿海，出於崑崙，拉錫所組探勘隊則具體指出，黃河的源頭是由星宿海和崑崙山附近群山諸泉聚流而成，最後匯入鄂陵湖，由此湖流出才是黃河正源。

康熙五十八年，〈皇輿全覽圖〉告成；康熙五十九年，聖祖再次根據地圖對河源發表看法，其曰：

黃河之源，出西寧外枯爾坤山之東，眾泉渙散，不可勝數，望之燦如列星，蒙古謂之敖敦他拉，西番謂之梭羅木，中華謂之星宿海，是為河源；匯為薩陵、鄂陵二澤。東南行，折北復東行，由歸德堡、積石關入蘭州。⁸⁰

本文採用者，是傅斯年圖書館所藏微卷⁸¹，是由德國學者福克司 (Walter Fuchs,

⁷⁶ [清] 傅恆等：《欽定西域同文志》（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35 冊），卷 14 〈青海屬地名〉，頁 15b 「鄂敦塔拉」條。

⁷⁷ 關於元、清蒙古讀音的不同，此處稍作說明：蒙古語 *odon*，元朝讀若「火敦」，清朝讀若「鄂敦」。「腦兒」(*nagur*) 是湖泊之意，「搭拉」(*tal-a*) 是草原、川原之意。因此，「火敦腦兒」直譯則為星星之海；「鄂敦搭拉」直譯則是星星之原。無論是星星之海，或是星星之原，史籍皆載曰「星宿海」。

⁷⁸ 南有古爾班吐爾哈山，西南有布胡珠爾黑山，西有巴爾布哈山，北有阿克塔因七奇山，東北有烏蘭杜石山。見馬齊等監修：《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卷 217，頁 11a-b 「九月丁卯」條。

⁷⁹ [清] 傅恆等奉敕編撰：《欽定西域同文志》，卷 16 〈青海屬水名〉，頁 15a-16a 「古爾班索里瑪勒郭」條。

⁸⁰ 馬齊等監修：《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卷 290，頁 4b 「十一月辛巳」條。清世宗敕編：《聖祖仁皇帝聖訓》，卷 52 〈廣幅員〉，頁 7a-b 「十一月辛巳」條。

⁸¹ 見附錄一「河源圖」。見福克司：《康熙時代耶蘇會教士地圖集》微卷（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

1902-1979)於一九四三年在輔仁大學影印的《康熙時代耶穌會教土地圖集》(*Der Jesuiten-Atlas Der Kanghsi-Zeit: Seine Entstehungsgeschichte nebst Namenindices für die Karten der Mandjerei, Mongolei, Ostturkestan und Tibet mit Wiedergabe der Jesuitenkarten in Originalgröße*)。〈皇輿全覽圖〉版本衆多，該幅地圖是將康熙五十六年的木刻本，與康熙六十年的木刻本合併影印⁸²，聖祖應該是根據康熙五十六年甫測繪完成的「河源圖」論述。附錄一的左上方有「西番界」，表示該圖是在西藏之東的版圖，即青海省。聖祖所謂的「枯爾坤山」（西經 19-20，北緯 35-36 之間）是山之總名，也就是拉錫等人所說的「庫爾滾」。其所指的「歸德堡」在地圖的東南方（西經 15-16，北緯 35-36 之間）；黃河進入甘肅省後，經「積石關」入蘭州⁸³，即〈禹貢〉「導河積石」之處。聖祖按圖索驥，說明黃河之源以及上游的流向，但是對於崑崙山的解釋不甚清楚。《尚書地理今釋》（以下稱《地理今釋》）有更詳細的說法：

崑崙山在今西番界，有三山：一名阿克坦齊禽，一名巴爾布哈，一名巴顏

⁸² 據福克司的研究，〈皇輿全覽圖〉有兩套木刻本：一是康熙五十六年出版的二十八幀地圖，二是康熙六十年出版的三十二幀地圖；此兩者的差異，在於後者修訂與新增〈河源〉、〈揚子江〉、〈西藏〉等圖。其後，福克司將三十二幀地圖，與康熙五十六年出版的〈河源〉、〈鴉磯〉、〈揚子江上流〉、〈吟密〉等舊圖合併影印，成為三十六幀的地圖。見船越昭生：《鎖國日本にきた康熙圖の地理學史的研究》（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1986年），前篇，第2章〈康熙圖の概観〉，頁21-22。然而傅斯年圖書館所藏的微卷，自第二十幀至三十五幀皆缺漏，且福克司所編的目錄亦缺這十五幀地圖，原因不明。見Walter Fuchs, *Der Jesuiten-Atlas Der Kanghsi-Zeit: Seine Entstehungsgeschichte nebst Namenindices für die Karten der Mandjerei, Mongolei, Ostturkestan und Tibet mit Wiedergabe der Jesuitenkarten in Originalgröße* (Peking: Fu-Jen Universität, 1943), S. 221。關於福克司影印〈皇輿全覽圖〉的版本，可參考馮寶琳：〈康熙皇輿全覽圖的測繪考略〉，《故宮博物院院刊》1985年第1期，頁25。趙震熙：〈皇輿全覽圖各版本對比研究〉，《滿族研究》2009年第4期，頁57。汪前進、劉若芳整理：《清廷三大實測全圖集：滿漢對照》（北京：外文出版社，2007年），〈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全國總圖的繪制〉，頁3。

⁸³ 案，「積石關」於本文所附的「河源圖」中不見，蓋聖祖另據他圖。此外，蘭州位在甘肅省，但是就「河源圖」來看，黃河出積石關以後，東流入陝西，而非甘肅省。這是緣於古今行政改革的關係。清代甘肅屬於明代陝西省的臨洮、鞏昌、平涼、慶陽四府。康熙二年，將陝西以西獨立建為甘肅省。雖然在行政區域上獨立為甘肅省，但是清朝沿用明制，置「總督」一職管理軍民，並掌有察舉官吏，管理軍務、糧饌、茶馬等權責，陝西、甘肅置一總督管理，故常見有陝甘總督之名。或由於此，所以「河源圖」未標示甘肅，而直標陝西。關於陝、甘沿革及陝甘總督職務，分見清高宗敕撰：《清朝通典》，卷94〈州郡〉，頁2721「甘肅省」條。趙爾巽等：《清史稿》，卷116〈職官·外官〉，頁3336、3339「總督」條。

喀拉，總名枯爾坤，譯言崑崙也。在積石之西，河源所出。⁸⁴

《地理今釋》為蔣廷錫(1669-1732)所撰。四庫館臣曰：「是編乃其官內閣學士時所作，首題『恭錄聖訓』，蓋倬直內廷之日，仰承指授，敬繕成帙者也。」⁸⁵蔣廷錫於康熙五十六年官內閣學士，六十年充經筵講官⁸⁶。康熙五十八年，〈皇輿全覽圖〉由蔣廷錫上呈⁸⁷，可見其在內閣時，深受聖祖信任。由斯推測：蔣廷錫於康熙五十六年至六十年(1718-1721)之間，參考經史地理之書，同時稽核〈皇輿全覽圖〉而撰成《地理今釋》。蔣廷錫指出，崑崙山是由阿克坦齊禽、巴爾布哈、巴顏喀拉等三座山合稱之名，即所謂「山脈」，而非單指一座高山⁸⁸。雖知河出崑崙山，但是崑崙山的位置，後人屢有爭議，或認為在西北的西域，或以為在西南的吐蕃，莫衷一是⁸⁹。蔣廷錫也檢討前人之說，其曰：

按：《漢書·地理志》金城郡臨羌縣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西有弱水、崑崙山祠。此蔡《傳》所據，以為崑崙在臨羌者也。然《漢志》言西有崑崙山祠，非言山在縣界。漢臨羌縣在今陝西西寧衛西，崑崙山不啻若是之近。……《元史·附錄河源》云：吐蕃朵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按：雪山今名爾托灰山，在崑崙之東，諸水所合，諸源匯流經其下，非即崑崙也，《元史》誤。又按：此崑崙山乃河水伏流發見之地，非四大水發源之崑崙也。⁹⁰

指出《漢書》所認知的崑崙山位置，即是清朝的陝西境內，如此一來，黃河源於陝西境內，距離未免太近。《元史》認為崑崙在吐蕃朵甘思東北，雖然範圍正

⁸⁴ [清]蔣廷錫：《尚書地理今釋》（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8冊），頁13a「崑崙」條。

⁸⁵ 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卷12經部，頁38a-b「尚書地理今釋」條。

⁸⁶ 馬子木：《清代大學士傳稿(1636-1795)》（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13年），〈雍正朝〉，頁234「蔣廷錫」條。

⁸⁷ 趙爾巽等：《清史稿》，卷8〈聖祖本紀〉，頁296。

⁸⁸ 「河源圖」枯爾坤山附近，有標出阿克坦齊禽、巴爾布哈、巴顏喀拉三座山名；阿克坦齊禽之名較模糊，但仍可辨識，其位在枯爾坤的右下角。

⁸⁹ 王鑿曰：「自昔言崑崙者，皆在西北。元使所圖，迺在西南，何也？」胡渭則曰：「然昔之言崑崙者，實有二處，一在西北為河源之所出，一在西南為弱水之所環，不得云皆在西北也。」胡渭認為王鑿謂崑崙山在西域，不在吐蕃，此看法有待商榷。而他自己提出崑崙山或在西域，或在吐蕃之說。姑不論胡渭之說是否正確，藉其整理，可以看出歷來之於崑崙山的位置有兩大說法。見胡渭著，鄒逸麟整理：《禹貢錐指》，卷13上〈附論河源〉，頁438、439。

⁹⁰ 蔣廷錫：《尚書地理今釋》，頁13a-b「崑崙」條。

確，但是蔣廷錫認為位置不夠精準。《元史》所說的崑崙山，又名亦耳麻不莫刺；亦耳麻不莫刺是古書中所指的積石山，位在巴顏喀拉山之東脈⁹¹，河源應該在亦耳麻不莫刺山更西之處。此外，蔣廷錫也糾正《元史》所記的崑崙山是黃河伏於地下後又重流至地表之處，即〈禹貢〉「浮於積石」，而非黃河、大通河、金沙江及瀾滄江之源的崑崙山處⁹²。其用心處，在於展現「國朝」地理探測較元朝精準。重要的是，清廷較元廷更有能力掌控西域，所以說《元史》的崑崙是「伏流」之地，清政府所探是「發源」之所，範圍又往西推進。

聖祖遣使探勘河源，十五年以後〈皇輿全覽圖〉出版，《地理今釋》則又能細指山川名號。地理考察在當時已非常全面，因此對河源的認識，能突破前人囿於〈禹貢〉「導河積石」一語。依聖祖君臣的看法，河源出於崑崙山，蒙古名為「庫爾滾」，或作「枯爾坤」；崑崙山非單指一座山，是由阿克坦齊禽、巴爾布哈、巴顏喀拉等三座山之總名（即山脈名號），故連延不絕，舊名積石山僅是崑崙山東脈之一支而已。崑崙山之水流出後，與其他山脈的泉水匯入札陵湖，再東入鄂陵湖。此一群山及兩大湖泊，構成黃河之源。

（二）長江之源

〈禹貢〉：「岷山導江」與「導河積石」的意思相近，就經書來看，大禹從岷山開始疏導長江，非指長江源於岷山。但是如前文所述，《漢書》認為「崦嵫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此說在宋代以前無太多歧見，直到宋人親自入川遊歷，

⁹¹ 《清史稿》曰：「〔黃河〕又東南流，曲曲七百餘里，繞大雪山南，古積石山也，番名阿木尼麻禪母遜阿林。……猶言『大冰山』也。山自巴顏喀喇東來，當黃河北岸，縣互三百餘里，上有九峯，甚高，冬夏積雪，……《元史》謂之亦耳麻不莫刺。」見趙爾巽等：《清史稿》，卷79〈青海〉，頁2459「青海和碩特部二十一旗」條。是以積石山有兩種譯名，一曰阿木尼麻禪母遜阿林，一曰亦耳麻不莫刺。黃河至此，是流經積石山之南。

⁹² 蔣廷錫曰：「夫崑崙為地軸，其山根連延，起頓包河，內接秦隴，直達長安。」從「河源圖」來看，枯爾坤（崑崙）山脈位在西隅，或許是地圖繪製技術不精密之故，因為既然崑崙山是山脈，應是連綿不絕的高山群。蔣廷錫認為崑崙山是從西番界上連延至長安，這一綿延數千里的山脈，乃四大江河的發源地。至於「河水伏流發見之地」，則在崑崙山脈東處。查《中國歷史地圖集》，崑崙山幾乎橫貫青海一省，而巴顏喀拉山則位在崑崙山東南，連綿至四川邊境。譚其驤(1911-1992)等所繪製的地圖自然較康熙年間更為精密，同時藉其所繪，可知崑崙山是連綿千里的山脈，而非位在一隅而已。以上論述，分別見蔣廷錫：《尚書地理今釋》，頁31b「黑水」條；頁33a-34a「雍州黑水」、「梁州黑水」、「導川黑水」條。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清時期》，〈青海〉，頁59-60。

始知江源不在岷山。范成大(1126-1193)曰：「江源政自西戎中來，由岷山澗壑出而會於此，故名都江。世云江出岷山者，自中國所見言之也。」陸游(1125-1210)曰：「西遊岷山，欲窮江源而不可得。蓋自蜀境之西，大山廣谷，豁訝起伏，西南走蠻夷中，皆岷山也，則江所從來尤荒遠難知。」⁹³兩者親見江水從岷山更西處而來，遂謂江源不在岷山，但是未實指江源從何而起。徐弘祖(號霞客，1587-1641)親探江源，撰有〈溯江紀源〉，曰：

按其發源，河自崑崙之北，江亦自崑崙之南，其遠亦同也。發於北者曰星宿海，北流經積石，始東折入寧夏，為河套，又南曲為龍門大河，而與渭合；發於南者，曰犁牛石，南流經石門關，始東折而入麗江，為金沙江，又北曲為敘州大江，與岷山之江合。余按：岷江經成都至敘，不及千里，金沙江經麗江、雲南、烏蒙至敘，共二千餘里。……第見〈禹貢〉「岷山導江」之文，遂以江源歸之，而不知禹之導，乃其為害于中國之始，非其濫觴發脈之始也。導河自積石，而河源不始於積石；導江自岷山，而江源亦不出於岷山，岷流入江，而未始為江源，正如渭流入河，而未始為河源也。⁹⁴

從〈禹貢〉的注解來看，學者對於河源不始於積石，認識較早，對於江源的判斷，多沿襲陳說。徐霞客自幼住在長江入海口處，認為長江水流量並不亞於黃河，因而推論長江的源頭不應較黃河短近，正因為抱著這樣的疑問，故展開溯江之旅⁹⁵。其指出黃河與長江皆源自崑崙山，河發源於山之北，江源自山之南。長江自崑崙山之南發源為犁牛河，向東以後為金沙江，至敘州與岷江匯合。徐霞客

⁹³ [宋] 范成大：《吳船錄》（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影印《知不足齋叢書》），卷上，頁3a「（淳熙丁酉）六月辛未」條。[宋] 陸游：〈成都府江濱廟碑〉，《渭南文集》（上海：上海書店，1989年《四部叢刊初編》），卷16，頁1a-b。

⁹⁴ [明] 徐弘祖著，褚紹唐等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卷10上〈溯江紀源〉，頁1127、1128。

⁹⁵ 徐霞客曰：「江、河為南北二經流，以其特達於海也。而余邑正當大江入海之衝，邑以江名，亦以江之勢，至此而大且盡也。生長其地者，望洋擊楫，知其大，不知其遠；溯流窮源，知其遠者，亦以為發源岷山而已。余初考紀籍，見大河自積石入中國，溯其源者，前有博望之乘槎，後有都實之佩金虎符。其言不一，皆云在崑崙之北，計其地，去岷山西北萬餘里，何江源短而河源長也？豈河之大更倍于江乎？」見同前註，頁1127。所提出的疑問是：(1) 長江之勢大於黃河，如此則江源與河源應該相去不遠，才可以累積相當大的水流量。(2) 既然江源與河源相當，黃河之源在崑崙之北，則長江之源不應止於岷山而已。

認為，如果設定長江的上游從岷江開始計算，至敘州不過千里；若以金沙江計之，便有兩千里之遠，故當以金沙江為長江正源。既然長江的上游始於金沙江，則「岷山導江」就不是指長江之源在岷山，而是長江自流經岷山與岷江匯合後，開始泛濫為害中國，故大禹自岷山疏導長江。為什麼河源比江源早發現？徐霞客解釋，江源始終囿於「岷山導江」的原因，在於「岷江為舟楫所通，金沙江盤折蠻僚谿峒間，水陸俱莫能溯」，以致「河源屢經尋討，故始得其遠；江源從無問津，故僅宗其近」⁹⁶，指出交通工具是局限探源的主要原因。

徐霞客的〈溯江紀源〉，嘗寄予錢謙益(1582-1664)閱讀，錢謙益盛讚可以補《水經注》及漢、宋儒者經注之不足⁹⁷，胡渭深不以為然，謂「霞客所言東西南北，茫然無辨，恐未必身歷其境，徒恃其善走，大言以欺人耳」，批評可謂相當嚴厲⁹⁸。康熙四十四年(1705)春，《禹貢錐指》透過侍講學士查昇(生卒年不詳)上呈御覽，深得聖祖讚賞⁹⁹。雖然如此，聖祖對長江源流的看法，折衷於徐霞客與胡渭之間，但是這不代表聖祖有意為之，其論點與測繪的地圖相合，乃據圖發論，並撰〈江源〉一文，曰：

中國水之大而流長者，惟河與江，其源皆出西番界：河之源自《元史》發明之後，人因得知其大畧；江之源則從未有能確指其地者。酈道元《水經注》頗言其端委，而於發源之處，則云「以今所聞，殆未濫觴」，道元亦闕疑而弗敢定也。今三藏之地，俱歸版籍，山川原委，皆可案圖以稽。乃知所謂「岷山導江」者，江水泛濫中國之始，禹從此水而導之，江之源實不在是也。江源發於科爾坤山之東南，三泉流出自注：一自匝巴顏哈拉嶺流出，名七七拉噶納；一自麻穆巴顏哈拉嶺流出，名麻穆七七拉噶納；一自巴顏吐呼母巴顏哈拉嶺流出，名古科克巴哈七七拉噶納。合而東南流，土人名岷捏撮；岷捏撮者，譯言岷

⁹⁶ 同前註，頁 1128。

⁹⁷ [清] 錢謙益：〈徐霞客傳〉，見同前註，卷 10 下，頁 1200-1201。

⁹⁸ 胡渭針對徐霞客的〈溯江紀源〉，特別撰寫〈附論江源〉反駁，觀點主要圍繞在崑崙山：(1) 指出文獻的記載中，崑崙山的位置並不確定，加上後人探勘結果，崑崙或在于闐，或在吐蕃，兩者相距甚遠，而徐霞客不顧文獻記載，以為崑崙是單指一座高山，並且以崑崙山的南北來論黃河與長江源頭，於是批評徐霞客「渾而一之，其不學無識一至此乎」。 (2) 明代僧人宗泐曾言，抹必力赤巴山西南流為犛牛河，即金沙江，與徐霞客所指江源相合。然而，胡渭認為抹必力赤巴山不是崑崙山，而且經有明言「岷山導江」，長江正源是岷江，並非金沙江。見胡渭著，鄒逸麟整理：《禹貢錐指》，卷 14 下〈附論江源〉，頁 569-570。

⁹⁹ [清] 李振裕：〈李序〉，同前註，頁 712。

江也。是為岷江之源。南流至岷納克地，名鴉龍江；又南流至占對宣撫司，會打沖河，入於金沙江，東流逕雲南境；至四川敘州府與川江合，是真江源根據。¹⁰⁰

地圖題名為「滿漢合璧清內府一統輿地秘圖」，銅版印刷，是康熙五十八年意大利傳教士馬國賢所刻，於民國十八年(1929)在瀋陽故宮發現，由金梁(1878-1962)重印流布。長城以內用漢字標地名，長城以外用滿文標出¹⁰¹。聖祖指出，所謂「岷山導江」是指長江在流經岷山以後始得泛濫，故大禹在岷山疏導之，並非謂長江之源在岷山，長江應是源於科爾坤山的東南方。又進一步指出，其源是由七七拉噶納、麻穆七七拉噶納、古科克巴哈七七拉噶納等三支河流匯流，合而東南流，是為岷江。地圖可見這三支河流之名：七七拉噶納，滿語作 *zacicirhana bira* (西經 18-19，北緯 33-34 之間)¹⁰²。麻穆七七拉噶納，滿語作 *mamu cicirhana bira* (西經 17-18，北緯 33-34 之間)。古科克巴哈七七拉噶納，滿語作 *kurkun baha cicirhana bira* (西經 16-17，北緯 33-34 之間)¹⁰³。三支流分別從西北往東南排列，匯合之後，東南流出，是為岷江；岷江南流後，是為鴉龍江，滿語作 *ya lung giyang* (地圖作鴉龍江，西經 15-16，北緯 28-30 之間)，於打沖河東折後，復南流，入金沙江(西經 14-15，北緯 26-27 之間)，經雲南後往東北流，於四川敘州府(西經 11-12，北緯 28-29 之間)向東流去，而在敘州府以後的河段，名為川江¹⁰⁴，此一流向乃長江之源。值得注意者，根據聖祖論點，此流向也是岷江之源。

¹⁰⁰ 清聖祖：〈康熙幾暇格物編·江源〉，《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98-1299 冊)，第四集，卷 31，頁 1a-2a。此文大約寫於康熙五十一年至六十一年(1712-1722)之間。據上文論述，在此期間，不同版本的〈皇輿全覽圖〉已陸續測繪完成，故細案聖祖所論江源的內容，在地圖中皆可索驥。關於聖祖撰寫文章的時間，參見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卷 173 集部，頁 1a-2b「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條。

¹⁰¹ Fuchs, *Der Jesuiten-Atlas Der Kanghsi-Zeit*, S. 60。船越昭生：《鎖國日本にきた康熙圖の地理學史的研究》，前篇，第 2 章〈康熙圖の概観〉，頁 22、23。〈皇輿全覽圖各版本對比研究〉，頁 57、59。汪前進、劉若芳整理：《清廷三大實測全圖集：滿漢對照》，〈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全國總圖的繪制〉，頁 3。

¹⁰² 在地圖中不見「七七拉噶納」，唯見「匝七七拉噶納」，蓋是音譯而有所出入。見汪前進、劉若芳整理：《清廷三大實測全圖集：滿漢對照》，第 5 排 4 號。

¹⁰³ 同前註。

¹⁰⁴ 地圖中並未標出岷江與川江。岷江之所以未標出的原因，聖祖有其解釋，而川江是金沙江流經敘州府的名稱，也就是習稱上的長江；關於岷江、川江，詳下討論。岷江入鴉龍江後，至四川敘州府的流向，參見同前註，第 6 排 4 號。

岷江位於長江上游，所以是長江正源，此說與〈禹貢〉相合，亦是胡渭堅持的觀點。然而聖祖有更詳細的看法，其曰：

後人但見打冲河之入金沙，金沙之入川江，而又據〈禹貢〉「東別爲沱」之文，謂川江爲岷江，溯流以窮源，謂江源必在黃勝關外，不知鴉龍江之上流，實爲江源也。故導江之江，有蜀江、離江、錦江、都江之稱，隨地隨時異名，而不得專岷江之目者，非其源也。¹⁰⁵

聖祖之見，約爲三部分說明：(1) 川江是金沙江過敘州府後的名稱，此後即是習稱的長江，而打冲河是鴉龍江下游之稱¹⁰⁶，故川江相對於「岷山導江」之處，已屬下游之段。聖祖認爲後人據〈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爲沱」之文，誤將下游的川江與上游岷江混爲一談，但其究竟指向哪位學者，不得而知¹⁰⁷。(2) 雖然後人已經探得江源不止於黃勝關外，卻無法確指發源之地，像范大成、陸游都已知「黃勝關流入之江非江源，而不能定其所在」¹⁰⁸，於是聖祖檢討二人之說，指出江源可以溯至鴉龍江上游。(3) 〈禹貢〉所導的岷江，是指疏導蜀江、離江、錦江、都江等上游支流，非指專有一條江爲岷江，並再次強調，岷江非江源，而是引其流¹⁰⁹。

〈禹貢〉沒有提到的金沙江，卻是長江上游重要支流。據上文討論聖祖的觀點，已知岷江是數條江段的總稱，其後注入金沙江，一路東流，故金沙江位在岷江下游。雖然岷江是上游，但是徐霞客認爲，長江之水所以大於黃河，主要是因

¹⁰⁵ 清聖祖：〈康熙幾暇格物編·江源〉，卷 31，頁 2a。

¹⁰⁶ 《皇朝輿地水道源流》：「至塔城關，即名金沙江。……至敘州府岷江河口，即名大江。」金沙江於敘州府匯入大江，可知金沙江是長江的上游，過敘州府後，則是習稱的長江。見〔清〕胡宣慶：《皇朝輿地水道源流》，收入石光明等主編：《中華山水志叢刊·水志卷》（北京：線裝書局，2004年影印清光緒十七年長沙胡氏重刊本），卷 5〈大江源流〉，頁 1a-b。趙爾巽等：《清史稿》，卷 69〈四川〉，頁 2221「寧遠府」條。

¹⁰⁷ 將川江與岷江混爲一談，應該不是學者造成的問題，而是習稱的關係。「長江」、「大江」之名是通稱，長江流經各地，有不同的稱呼。就四川境內而言，在宜賓稱爲汶江、都江；在奉節稱爲岷江；在彭山又稱爲汶江，或名武陽江，其名稱之繁多如此，自然容易混淆。見趙爾巽等：《清史稿》，卷 69〈四川〉，頁 2217「敘州府」條；頁 2219「夔州府」條；頁 2236「眉州直隸州」條。

¹⁰⁸ 清聖祖：〈康熙幾暇格物編·江源〉，卷 31，頁 2b。

¹⁰⁹ 聖祖曰：「〈禹貢〉『岷山導江』，乃引其流，非源也。」可知其對於前人以岷江爲長江之源的說法，有檢討之意。見馬齊等監修：《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卷 290，頁 5a「五十九年十一月辛巳」條。清世宗敕編：《聖祖仁皇帝聖訓》，卷 52〈廣幅員〉，頁 7b「（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辛巳」條。

爲長江上游有金沙江的關係，而且金沙江遠較岷江來得長，「故推江源者，必當以金沙爲首」¹¹⁰，將金沙江視爲長江正源，此說引來胡渭批評。儘管如此，金沙江的確是長江上游的一支，於是聖祖討論金沙江之源，其曰：

金沙江之源，自達賴喇嘛東北烏尼尹烏蘇峯流出。烏尼尹烏蘇峯，中華謂之乳牛山也，其水名穆魯斯烏蘇，東南流入喀木地，又經中甸，入雲南塔城關，名金沙江；至麗江府，又名麗江。至永北府會打（衝）〔沖〕河東流，經武定府，入四川界，至敘州府，流入岷江。¹¹¹

聖祖指的「乳牛山」、「喀木地」及「中甸」等地名，在地圖中未標出¹¹²，但是可見金沙江源於穆魯斯烏蘇，滿語作 murui usu bira（西經 24-25，北緯 34-35 之間）¹¹³，一路往東南流去，進入雲南塔城關（西經 16-17，北緯 27-28 之間），始名爲金沙江。進入麗江府（西經 16-17，北緯 26-27 之間）後名爲麗江，南流經永北府（西經 15-16，北緯 26-27 之間）旋即東流，與自北南下的打沖河匯合，再東流經武定府（西經 13-14，北緯 25-26 之間）¹¹⁴，北折流去，最後在四川敘州府入岷江¹¹⁵。明代宗泐認爲崑崙山自西南流爲江源，後注入犛牛河，犛牛河即金沙江，因此後人解讀中，以爲宗泐所指的犛牛河便是江源¹¹⁶，聖祖檢討

¹¹⁰ 徐弘祖著，褚紹唐等整理：《徐霞客遊記》，卷 10 上〈溯江紀源〉，頁 1128。

¹¹¹ 馬齊等監修：《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卷 290，頁 5a-b「五十九年十一月辛巳」條。清世宗敕編：《聖祖仁皇帝聖訓》，卷 52〈廣幅員〉，頁 8a〔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辛巳條。案：金沙江之源，滿語作 murui usu bira，中文音譯有三：穆魯斯烏蘇河、母魯烏蘇河、木魯烏蘇河，三者分別出現在《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康熙政要》，以及《中國歷史地圖集·清時期》，譯名不同，其指一也。

¹¹² 案：乳牛山不見於史籍、地圖，因此不知所指。喀木地，前藏之地，東臨四川，北臨青海，南接雲南麗江府，本屬呼圖克圖，康熙五十八年以後，清政權逐步控制。中甸，明朝屬麗江府；康熙時期，「吳逆之變」將中甸畫給達賴喇嘛；雍正五年（1727）以後，派遣劍川州判駐防；乾隆十一年（1746）設廳，二十一年（1756）改爲同知，仍屬麗江府。以上論述，見〔清〕和坤等：《欽定大清一統志》（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74-483 冊），卷 413〈西藏〉，頁 6a-b「喀木」條；卷 382〈麗江府〉，頁 3a-b「中甸同知」條。趙爾巽等：《清史稿》，卷 80〈西藏〉，頁 2472-2473「康」條；卷 74〈雲南〉，頁 2328「麗江府」條。

¹¹³ 汪前進、劉若芳整理：《清廷三大實測全圖集：滿漢對照》，第 5 排 5 號。

¹¹⁴ 金沙江進入塔城關，至四川敘州府的流向，參見同前註，第 6 排 4 號。

¹¹⁵ 聖祖謂金沙江至永北府東流，然後流入岷江，所謂「岷江」，指的是「川江」。在上文的討論中，聖祖曾指出前人誤將川江視爲岷江；下面的引文中，亦可見金沙江東流後是川江，而非岷江。此處聖祖明顯也受到前人之說而誤。

¹¹⁶ 胡渭著，鄒逸麟整理：《禹貢錙指》，卷 14 下〈附論江源〉，頁 570。

曰：

宗泐使西域，歸云「西番抹必力赤巴山有二水：在東北者爲河源，在東南者爲犛牛河，江源也」。犛牛河即麗江，一名金沙江者，宗泐但見是水之先合於金沙江，而後合於川江，不知金沙江別源於西番之乳牛山，去江源西千餘里，乃謂岷江即金沙，誤矣。¹¹⁷

宗泐是否將金沙江視爲岷江，不得而知。卻可以看出聖祖認爲岷江是長江正源，金沙江則別自西番的烏尼尹烏蘇峯（乳牛山）流出，較江源更西之處¹¹⁸，自源頭流出後，於永北府後與岷江其中一段：「打沖河」匯合，然後一同向東流去。

聖祖對於江源的看法，大抵以舊說爲主，其從地圖中證明，岷江與長江同出一源，故岷江爲長江正源，同時也承認金沙江是長江的另一源頭。徐霞客認爲江水流量大於河水，因此必須把金沙江納入江源，才可以解釋江水之大的原因，此論點獲聖祖的認同¹¹⁹。職是，聖祖以爲長江有二源：正源源出於科爾坤山的東南方，由七七拉噶納、麻穆七七拉噶納、古科克巴哈七七拉噶納，此源也是岷江之源；此外尚有金沙江一源，其源頭出於西番的穆魯斯烏蘇河，於永北府與打沖河合流。正由於二源合流，故江水倍於河水¹²⁰。

（三）黑水與三危

〈禹貢〉有三次談到黑水：「華陽黑水惟梁州」，是爲梁州黑水；「黑水西河惟雍州」，是爲雍州黑水；「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是爲導川黑水。雍州在梁州之北，雍州地勢高於梁州¹²¹，因此順著經文之意：黑水流經三危山，

¹¹⁷ 清聖祖：〈康熙幾暇格物編·江源〉，卷31，頁3a-b。

¹¹⁸ 從地圖及上文所述，江源最西處在約西經十八·五度，金沙江源在約西經二十五·二度，顯見金沙江源在江源之西，其相差約六·七度。據聖祖所統一的經緯度數，「以今時之尺筭之，天上一度，即有地下二百里」來計算，則有一三四〇里左右，符合聖祖認爲的「金沙江別源於西番之乳牛山，去江源西千餘里」。關於聖祖統一的經緯度數與里數，見庫勒納等：《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臺北所藏），第19冊，頁10670「五十年五月初五日癸巳」條。

¹¹⁹ 清聖祖：〈康熙幾暇格物編·江源〉，卷31，頁3b-4a。

¹²⁰ 上述亦可參考附錄二「長江之源」、附錄三「金沙江」。自附錄二開始，皆採用汪前進、劉若芳整理的《清廷三大實測全圖集：滿漢對照》，除注腳指出資料來源外，爲閱讀方便，筆者亦掃描圖檔，並標示地名、河流，編上名稱，以供參酌。

¹²¹ 孔《疏》曰：「從梁而北次雍，雍地最高。」孔《傳》曰：「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見題孔安國注，孔穎達疏：《尚書正義》，卷6〈禹貢〉，頁2b、

又經雍、梁二州，然後入於南海。「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這句，意思與上文所引的「導河積石」與「岷山導江」類似，未論及黑水之源。不同的是，經書對於黑水，沒有說明自何處開始疏導，而是疏導黑水至於三危，最後流入南海。關於黑水源自何處，《山海經》曰：「黑水出〔昆侖之虛〕西北隅，以東東行，又東北，南入海。」¹²²《水經注》曰：「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¹²³鄭玄曰：「三危山，黑水出其南。」¹²⁴三國時期經學家張揖（生卒年不詳）注解司馬相如（約 179-117 B.C.）〈大人賦〉「直徑馳乎三危」句，進一步說明：「三危山在鳥鼠山之西，與嶠山相近，黑水出其南陂，《書》曰『導黑水至于三危』也。」¹²⁵至此，黑水之源有三說：出於崑崙西北隅、源自張掖雞山、發於三危山。所以衆說紛紜，可能是黑水早已乾涸不在，或是水域不在中國之故¹²⁶。雖然如此，後世學者仍試圖尋找黑水的蹤跡，其方法則是由入南海的河川，回溯其源頭，因此說法更加多元。透過胡渭的整理，知學者所謂「黑水」有瀾（闌）滄江、麗水、金沙江等名稱，無論何種名稱，皆以為在外族之域。至於三危山，或為雍州之山，或指雲龍州東江上其中一山，言人人殊¹²⁷。胡渭對此批評：

彼黑水者，不由中國入海，又雍西久沒於戎翟，新流故道，夫孰為紀之，而孰為傳之邪？禹治黑水，不若治河之詳。河歷千六百餘年，而亦不免於徙，則黑水之改流較速，疑當在定王之前。自屈原已不能知，而況伏生輩乎！自古文《尚書》家已不能知，而況班固、司馬彪、酈道元、魏王泰諸人乎！至若樊綽、程大昌、金履祥、李元陽等，紛紛辨論，如繫風捕景，了無所得，徒獻笑於後人而已。¹²⁸

24b。

¹²² 郭璞注，畢沅校：《山海經》，卷 11〈海內西經〉，頁 1375。

¹²³ 題孔安國注，孔穎達疏：《尚書正義》，卷 6〈禹貢〉，頁 25a。案：今所見《水經注》無此語。

¹²⁴ [漢]鄭玄注，[宋]王應麟輯，[清]孔廣森增訂：《尚書鄭注》，收入古風主編：《經學輯佚文獻彙編》（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 年影印清光緒間定州王氏刻本《鄭學彙函》），卷 2〈禹貢〉，頁 12a「黑水西河惟雍州」條。

¹²⁵ 班固著，顏師古注：《漢書》，卷 57 下〈司馬相如傳〉，頁 2596、2598。

¹²⁶ 胡渭著，鄒逸麟整理：《禹貢錐指》，卷 12，頁 397-398「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條。

¹²⁷ 同前註，頁 398-404「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條。

¹²⁸ 同前註，頁 405「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條。

黑水所以杳無蹤跡，在於黑水源於西域，又出於南海，其流域都是外族政權盤據之地。加上河流善徙，故經書所載的黑水，可能因改道而消失。既然現實中已無黑水，學者們討論的黑水與三危山，當然不能確指，更經不起驗證，最後只能淪為紙上爭論而已。

黑水實指哪一江水，說法紛紛，胡渭認為黑水已不可尋，聖祖則言黑水在瀾滄江之西，其曰：

瀾滄江有二源：一源於喀木之格爾幾雜噶爾山，名雜褚河；一源於濟魯肯他拉，名敖母綽河。二水會於察木多廟之南，名拉克褚河，流入雲南境為瀾滄江；南流至車里宣撫司，名九龍江。流入緬國，瀾滄之西為喀喇烏蘇，即〈禹貢〉之黑水，今雲南所謂潞江也。¹²⁹

依聖祖之言，按圖索驥，可見得瀾滄江上游有二源，分別由東北處的雜褚河，滿語作 dzaco bira（西經 18-19，北緯 31-32 之間），以及西北處的敖母綽河，滿語作 omco bira（西經 18-19，北緯 31-32 之間），兩河相匯於察木多廟之南。察木多廟，滿語作 camdo miyoo（西經 18-19，北緯 31-32 之間）。兩河匯合之後，即名為拉克褚河，滿語作 lacu bira（西經 18-19，北緯 31-32 之間）¹³⁰。此後南流至雲南境內，始名瀾滄江，瀾滄江之西即可見怒江，持續往南即名潞江（西經 17-18，北緯 27-28 之間）¹³¹。聖祖接著指出：

其水自達賴喇嘛東北哈拉腦兒流出，東南流入喀木界，又東南流入怒彝界為怒江，入雲南大塘隘更名潞江。南流經永昌府潞江安撫司境，入緬國。¹³²

¹²⁹ 馬齊等監修：《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卷 290，頁 5b-6a「五十九年十一月辛巳」條。清世宗敕編：《聖祖仁皇帝聖訓》，卷 52〈廣幅員〉，頁 8b「〔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辛巳」條。

¹³⁰ 汪前進、劉若芳整理：《清廷三大實測全圖集：滿漢對照》，第 5 排 4 號。「廟」的滿語應作 juktehen，地圖中則以漢語音譯為 miyoo。

¹³¹ 汪前進、劉若芳整理：《清廷三大實測全圖集：滿漢對照》，第 6 排 4 號。至於聖祖所稱「喀喇烏蘇」是蒙古語，蒙古語作 qar-a usu。「喀喇」是黑之意，「烏蘇」乃水之意，故可譯為「黑水」。《清史稿》曰：「潞江在瀾滄西，發源於衛地之布喀大澤，淵澄黝黑，又多伏流，蒙古呼黑為『喀喇』，水為『烏蘇』，故名喀喇烏蘇。」見趙爾巽等：《清史稿》，卷 80〈西藏〉，頁 2473「康」條。「喀喇」為語音，書寫時為「哈拉」。

¹³² 馬齊等監修：《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卷 290，頁 6a「五十九年十一月辛巳」條。清世宗敕編：《聖祖仁皇帝聖訓》，卷 52〈廣幅員〉，頁 8b-9a「〔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辛巳」條。

所謂「腦兒」，前文已說明過，乃湖泊、大澤之意，故「哈拉腦兒」，黑澤也，蒙古語可作 qar-a nagur。地圖在轉譯為滿語的過程中，保留「哈拉」的發音，「大澤」則譯為「池」，因此哈拉腦兒，滿語作 hara omo（西經 24-25，北緯 32-33 之間）。自哈拉腦兒流出即是哈拉烏蘇（喀喇烏蘇），滿語作 hara usu bira（西經 24-25，北緯 32-33 之間）¹³³。哈拉烏蘇東南流經喀木地，一路上經過怒夷界、大塘隘、永昌府（西經 17-18，北緯 25-26 之間）後，流出中國境內（西經 17-18，北緯 24-25 之間）¹³⁴，聖祖以為此水即是〈禹貢〉黑水¹³⁵。

不僅黑水之說莫衷一是，三危山究竟位在哪處，學者也辯論不休。鄭玄認為三危山在鳥鼠之西、積石之西南，與岐山相連，而南面岷山¹³⁶。《括地志》云：「三危山有三峯，故曰三危，俗亦名卑羽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三十里。」¹³⁷《正義》則以為「三危為西裔之山也，其山必是西裔，未知山之所在」，雖然概略指出三危位在西域，但是「必在河之南也」¹³⁸。胡渭根據史籍所載，指出「三危山，自當以在沙州者為是」¹³⁹。說法固然不一，卻都意在符合三危位於中國九州最西之處。聖祖面對前人不確定的說法，據圖指出三危的實際位置，其曰：

〈禹貢〉導黑水至於三危，舊注以三危為山名，而不能知其所在。朕今始考其實，三危者，猶中國之三省也：打箭爐西南，達賴喇嘛所屬為危地；拉里城東南為喀木地；班禪額爾德尼所屬為藏地，合三地為三危耳。哈拉烏蘇由其地入海，故曰：「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也。」¹⁴⁰

聖祖所論，在目前所見的地圖上並未標注，或許是根據當時重新測繪西藏的圖稿而發表¹⁴¹。就聖祖之說，三危位在西藏的喀木地、危地與藏地，相當於三個省的

¹³³ 汪前進、劉若芳整理：《清廷三大實測全圖集：滿漢對照》，第 5 排 5 號。

¹³⁴ 同前註，第 6 排 4 號、第 7 排 4 號。

¹³⁵ 上述亦可參考附錄四「瀾滄江及怒（潞）江」。

¹³⁶ 題孔安國注，孔穎達疏：《尚書正義》，卷 6〈禹貢〉，頁 21a。又，司馬遷著，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卷 2〈夏本紀〉，頁 21。

¹³⁷ [唐]李泰等著，賀次君輯校：《括地志輯校》（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卷 4〈沙州〉，頁 228「燉煌縣」條。

¹³⁸ 題孔安國注，孔穎達疏：《尚書正義》，卷 6〈禹貢〉，頁 20b、21a。

¹³⁹ 胡渭著，鄒逸麟整理：《禹貢錙指》，卷 10，頁 324「三危既宅三苗丕斂」條。

¹⁴⁰ 馬齊等監修：《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卷 290，頁 8a「五十九年十一月辛巳」條。清世宗敕編：《聖祖仁皇帝聖訓》，卷 52〈廣幅員〉，頁 10b「（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辛巳」條。

¹⁴¹ 方豪(1910-1980)指出，聖祖在康熙五十年(1711)以前，曾派員測繪西藏地圖。康熙五十年，圖成，本欲加入〈皇輿全覽圖〉，但是地圖過於簡陋，聖祖要求重繪。康熙五十六

合稱，將舊注的三危山，認定為三個區域，而且哈拉烏蘇（黑水）之源的哈拉腦兒（黑澤），便是位在西藏境內。哈拉烏蘇經喀木地、危地與藏地，後流入南海，此乃聖祖所定義的「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也」。

康熙五十九年收編西藏以前，〈滿漢合璧清內府一統輿地秘圖〉就已經繪有西藏的地圖，雖然有部分地名未標注，卻也提供聖祖許多訊息。其從地圖中發現西藏有黑澤，自黑澤發源即是黑水，流經喀木地、危地與藏地，便指稱是〈禹貢〉所稱的「三危」，經三危持續往東南，進入雲南的怒江與潞江，最後經緬甸而入南海。聖祖對於「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的論點，主要是根據新的疆域發論，與舊說牽合於經、史的看法不同，顯得相當新穎¹⁴²。

年，圖成，收入〈皇輿全覽圖〉中。見方豪：《中西交通史》，第4篇第7章〈地理學〉，頁868-869。上文曾引述聖祖於康熙五十九年所說「三藏阿里之地，俱入版圖，其山川名號，番漢異同，當於此時考證核」之語，據船越昭生研究指出，是聖祖針對康熙五十八年出版的〈滿漢合璧清內府一統輿地秘圖〉而發言，其中於康熙六十年出版的木刻地圖中，又增補西藏地名。見船越昭生：《鎖國日本にきた康熙圖の地理學史的研究》，前篇，第2章〈康熙圖の概観〉，頁23。綜合前人研究，可知測繪西藏的工作在康熙五十六年之後，仍不斷進行，而且持續修正。因此，康熙五十八年出版的〈滿漢合璧清內府一統輿地秘圖〉，固然繪有西藏地圖，但是部分地名尚未標注；康熙五十九年進一步控制西藏後，聖祖更加要求詳細考察「其山川名號，番漢異同」，最後反映在康熙六十年出版的地圖中。從福克司根據康熙六十年的地圖而編成的目錄來看，並無聖祖提及的三危之地。蓋聖祖所論是大範圍的區域，所以地圖亦未標注。關於福克司所編目錄，見Fuchs, *Der Jesuiten-Atlas Der Kanghsi-Zeit*, S. 221-372。雖然地圖未標注，但是以理推之，聖祖不可能親臨西藏考察，因此可能是根據當時重新測繪的圖稿而討論三危之地。至於聖祖所謂的三危，即衛地、藏地與喀木地。衛地，古稱危，一曰前藏，或曰中藏，東界喀木地，西界後藏，南界不丹，北界青海與新疆，拉薩為最大城。藏地，即後藏，南界尼泊爾，東界衛地，西界阿里地，北界新疆，日喀則為最大城。喀木地，即前藏，又曰昌都，東界四川，南界珞瑜境與阿薩密，西界衛地，北界青海，巴塘城為最大城。見和坤等：《欽定大清一統志》，卷413〈西藏〉，頁6a-8b「衛」、「藏」、「喀木」諸條。趙爾巽等：《清史稿》，卷80〈西藏〉，頁2470「衛」條；頁2475「藏」條；頁2472「康」條。

¹⁴² 劉起鈞認為聖祖的說法與舊注不同，不過是眾多見解之一。今人高師第也認為歷來討論黑水的學者甚眾，但是終究沒有答案，而且所得結論似與〈禹貢〉所載黑水皆無關係。二說固然，卻不可忽略聖祖的三危與黑水之說，有其意義（詳下論述）。至於大陸學者田曉岫根據聖祖的說法，推論西藏早就載於〈禹貢〉之說，大可不必。三危與黑水雖然屬於西域，而是否實指西藏，就〈禹貢〉經文來說，無法確定。正因為經文留有可解讀的空間，故歷來學者眾說紛紜，聖祖之說不過是根據新收編的疆域而論，未必就是〈禹貢〉所指的三危與黑水。以上學者之論，分見劉起鈞：〈三危、弱水、黑水考〉，《尚書研究要論》（濟南：齊魯書社，2007年），頁282。高師第：〈黑水考〉，《禹貢研究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261-263。田曉岫：〈西藏載入中國版圖始見於夏書禹貢〉，《中央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5期，頁94-100。

四、清聖祖考辨〈禹貢〉的意義

從上文分析來看，聖祖早年透過經書學習〈禹貢〉，到晚年藉〈皇輿全覽圖〉說解〈禹貢〉。其學習動機，起初是出於戰事與統治的需要，後來則在證明大一統的實踐。大一統之說具體見於《公羊傳》（隱公元年）：

〔《經》曰：〕「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解詁》曰：〕統者，始也，揔繫之辭。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於天下，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莫不一一繫於正月，故云：「政教之始。」¹⁴³

《公羊傳》從曆法談論大一統。在周天子統治之下，自公侯乃至一草一木，皆受天子制定的時序安排活動，以此象徵大一統局面。但是要在天子治下的領土才能奉行天子的曆法，因此「統治的疆域」也成爲大一統之象徵，而且「疆域」比「曆法」來得更具有確定性。

宋儒王炎(1138-1218)釋「禹貢」名義，曰：「賦者，諸侯以供其國用；貢者，諸侯以獻于天子。挈貢名篇，有大一統之義焉。」¹⁴⁴ 揭示以「貢」名篇，即可見其大一統的意涵。天子收取天下貢賦，其功德必然被於四海，使廣土衆民感受到王化之風。〈禹貢〉紀錄大禹治水的功績以說明帝王治道，《正義》曰：「禹之得王天下，以是治水之功，故以爲〈夏書〉之首」¹⁴⁵。禹所以得天下，在於能安治百姓，顯示禹之功德被於宇內。宋儒陳應行（生卒年不詳）跋程大昌《禹貢論》與《禹貢山川地理圖》，指出其書能「啓沃帝心，且以東漸西被，教暨朔南，爲惓惓之忠盡在于此。」¹⁴⁶ 顯見學者孜孜於山水考辨，無非是期望君

¹⁴³ 題〔漢〕公羊壽傳，〔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公羊傳》（《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本），卷1，頁5a-9a。

¹⁴⁴ 轉引自〔清〕朱鶴齡：《禹貢長箋》（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7冊），卷1，頁1b。王炎此語蓋出於〈禹貢辨〉，然而四庫館臣曰：「〔王炎〕所著有〈讀易筆記〉、〈尚書小傳〉、……〈禹貢辨〉、……總題曰『雙溪類稿』，今已無傳。」見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卷160集部，頁2b-3a「雙溪集」條。〈讀易筆記〉等篇尚在，而〈禹貢辨〉已不見，故此處轉引自《禹貢長箋》。

¹⁴⁵ 題孔安國注，孔穎達疏：《尚書正義》，卷6〈禹貢〉，頁1b。

¹⁴⁶ 陳應行跋文，見〔宋〕程大昌：《禹貢山川地理圖》（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影印

王讀〈禹貢〉能思教化天下，以上承大禹之功德。明儒茅瑞徵(1575-1637)也明白道出，「〈禹貢〉一書，乃昔神禹開闢天地，經緯六合，另出手眼，非比尋常」，因此疏解〈禹貢〉，志在使「禹之明德，於今猶在天壤間也」¹⁴⁷。在在說明〈禹貢〉象徵著聖君繼承禹德而統治神州的意義。

聖祖透過輿地來展現繼承中原，以及大一統的實踐。康熙十八年(1679)，聖祖〈御製皇輿表序〉：

粵稽在昔，帝王體國經野，莫不坐撫輿圖，協同倫軌。所以〈禹貢〉山川繫以州域，〈職方〉風土辨乃井疆；簡牒之所陳，《詩》、《書》之所紀，粲然其可觀矣。……從來土壤有定，建置無常，上溯唐虞，下迄勝國，閱四千餘年之久，歷二十三代之遙，損益廢興，難以具舉。……從表體則地緯時經，期於徵信用是。特命儒臣，仿史表例，校讐編輯。或始分而後并，或暫合而終離。郡屬統名，縣稽實土，總前史以鈎索，彙百派於同源，信所謂若網在綱，有條不紊者也。¹⁴⁸

「上溯唐虞，下迄勝國，閱四千餘年之久」對此時的聖祖來說，這句話只是傳達理念，因為《皇輿表》將行政區域的分合，以「地緯時經」的表格呈現，固然意味清朝上承歷史天命而統治中原，但是對輿圖隻字不提，或許與當時未有測繪輿圖的計畫有關，加上內有三藩未削政局不穩，文治武功尚待發展，故所論只是表面之詞。就目前的研究成果及文獻，無法確切得知聖祖於何時開始有測繪地圖的計畫。上文提及，康熙二十三年，聖祖經歷三藩之亂以後，對地圖的正確性與否深有體會，康熙二十五年，聖祖下令纂修《大清一統志》（以下稱《一統志》）可略見端倪，諭曰（康熙二十五年五月初七日）：

朕惟古帝王宅中圖治，總攬萬方，因天文以紀星野，因地利以兆疆域，因人官物，曲以修政教，故〈禹貢〉五服，〈職方〉九州，紀於典書，千載可觀。朕纘紹丕基，撫茲方夏，恢我土宇，達於遐方。惟是疆域錯紛，幅員遼闊，萬里之遠。……漢以來，方輿地理，作者頗多，詳略既殊，今昔互異。爰勅所司，肇開館局，網羅文獻，質訂圖經，將蒼萃成書，以著一

《指海》本），卷下，頁195。

¹⁴⁷ [明]茅瑞徵：〈禹貢匯疏序〉，《禹貢匯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第54冊影印明崇禎刻本），敘頁1a、2b。

¹⁴⁸ 清聖祖：〈御製皇輿表序〉，[清]揆敘等：《皇輿表》（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出版年不詳影印康熙四十二年內府刊本），序頁1a-3a。

代之鉅典，名曰「大清一統志」。……阨塞、山川、風土、人物，指掌可治，畫地成圖。萬幾之餘，朕將親覽。¹⁴⁹

有德者得天下，元、明「一統志」之纂修，都象徵該王朝對領土的掌握，同時也藉此證明疆域之大，遠邁前朝，以見君德之盛。聖祖固然是承繼過去的歷史傳統，但是特別交代一統志館總裁，地理輿圖或因地貌的改變、疆域的更動、行政區域的變遷等因素，造成「詳略既殊，今昔互異」之情況，故要求廣蒐文獻，「質訂圖經」。換言之，如何藉由輿地展現清政權控制的土宇遐方，是一統志館臣的重要任務。

聖祖展現武功的同時，也積極測繪輿圖，以實踐其「質訂圖經」的要求。由於版圖擴大，聖祖不再局限於對歷史的傳承，而是四海歸順的自信。康熙四十二年(1703)增修的《皇輿表》，聖祖作序曰：

《皇輿表》一編，肇成於康熙己未，製序卷端，時置几案，歷有年所。顧原編紀載沿革，於郡縣特詳，其地列輿圖而未設有郡縣者，槩未編入。朕惟國家統御方夏，覆載之內，視均一體，外藩蒙古諸屬國，自祖宗朝後，先收服，次第歸誠。迨朕臨御以來，蕃王君長，歲時貢琛，悉比內地，繡壤相錯，不啻萬有餘里。邇者喀爾喀青海部眾稱臣嚮附，土宇益廓，計其山川封域，斥堠之所屆，分野之所屬，皆按地而可考也。¹⁵⁰

與康熙十八年的序文相較，四十二年的序文，除說明《皇輿表》增列新編的郡縣外，也強調「外藩蒙古諸屬國」的歸順，以及「喀爾喀青海部眾稱臣嚮附」，展現近悅遠來之氣象，此氣象並非抽象不可視，乃是「按地而可考」的實際存在。

《皇輿表》成於康熙四十二年，尚無法完整反映聖祖晚年的武功。康熙六十年的〈皇輿全覽圖〉將西藏納入，對聖祖而言更顯大一統的意義。歷代疆域多半以中原地區為主，西域始終是歷代政權難以企及之地，所以儒者對〈禹貢〉「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一語，也就難以驗證。康熙五十三年至五十九年(1714-1720)，聖祖藉著平定西藏的準噶爾之亂而派兵進駐¹⁵¹；康熙六十年御製〈平定西域碑文〉，宣示「俾中外知達賴喇嘛等三朝恭順之誠，諸部落累世崇奉

¹⁴⁹ 清聖祖：〈諭一統志館總裁勒德洪等〉，《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第二集，卷4，頁3a-b。

¹⁵⁰ 清聖祖：〈御製增修皇輿表序〉，增修序頁1a-2a。

¹⁵¹ 和坤等：《欽定大清一統志》，卷413〈西藏〉，頁3b。趙爾巽等：《清史稿》，卷80〈西藏〉，頁2469「西藏」條；頁2474「拉里」條。

法教之意，朕之此舉所以除逆撫順，綏衆興教云爾」¹⁵²。西藏此時尚未正式納入清朝版圖，但是朝廷認爲西藏已爲政府控制，故蔣廷錫面對前儒考訂黑水時的衆說，遂曰：

梁州之黑水有兩支，而與導川之黑水實出一源也，而古未有及之者，蓋以二水僻在番界，隔蔽南山阻奧，從古未通中國。即魏之法顯，唐之玄奘，元世祖之南征，丘處機之西遊，皆繞出崑崙以外，歷西域諸國至於滇南，既未嘗經其地，但從入中國之支流，以古今分域配之，料約爲某水某水而已。今四海大一統，皇上恩威所屆，靡不霑被震懾，郵傳所至，迎將恐後，特命使臣遠歷西番，究原討委，寫圖以誌，支派經絡，瞭如指掌，諸家浮說，有所折衷矣。¹⁵³

西藏歸附清廷，聖祖得以派員測繪地圖，然後案輿圖考論黑水與三危。蔣廷錫參考諸儒之說與地圖，將黑水分爲雍州、梁州與導川黑水，其中導川黑水便是「入于南海」的黑水，此水是「禹跡之所不至」，而且「未嘗流入內地，故從古無人知其源委也」¹⁵⁴。若非聖祖武功遠播，何以能詳考黑水與三危呢？同時彰顯出聖祖的功德幾乎遠邁大禹¹⁵⁵。

四庫館臣曰：「《尚書》一經……宋以來所聚訟者，莫過〈禹貢〉之山川」¹⁵⁶，〈禹貢〉講求實地實證，過去儒者難以親眼目睹山川地貌，只能就經史子傳排比考論，結果莫衷一是。即使胡渭的《禹貢錐指》有「考究精密」、「搜采殆徧」之譽，仍不免有「其時西域未平，無由徵驗」之譏¹⁵⁷。聖祖晚年的武功及於西域，加上〈皇輿全覽圖〉測繪完成，才能徵驗徼外新疆。聖祖考辨〈禹貢〉山川中，所論多是自古中原政權控制力較薄弱的西域，透過考論西域的山川地名，實踐〈禹貢〉的正確性，同時藉糾正前儒說法之誤，宣示統治疆域之廣，證明自己德比上古聖君，使四海歸服。反過來說，四海歸一，才能「考證明核」大禹所傳下來的九州之域。

¹⁵² 同前註，卷 413〈西藏〉，頁 4a-b。

¹⁵³ 蔣廷錫：《尚書地理今釋》，頁 32a-b「黑水」條。

¹⁵⁴ 同前註，頁 33a-35a「雍州黑水」、「梁州黑水」、「導川黑水」條。

¹⁵⁵ 聖祖在口頭及文字上，當然不會自認功德遠邁大禹，但是透過蔣廷錫之語，可窺知聖祖自比上古聖君的心理。

¹⁵⁶ 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卷 12 經部，頁 21b「日講書經解義」條。

¹⁵⁷ 同前註，卷 12 經部，頁 34a-35a「禹貢錐指」條。

五、結論

聖祖考辨〈禹貢〉而證大一統事業，在李紱(1673-1750)與清高宗(弘曆，1711-1799，在位年1735-1796)身上持續發酵。李紱於雲南鄉試時，出五道策問，其中一道問及雲南境內的長江、金沙江與黑水等相關問題：

問：滇南古梁州之裔，其山川不見稱於〈禹貢〉，何歟？論者謂北金沙江爲長江之源，南金沙江爲黑水之流，其果可據歟？江紀南國，黑水界雍、梁，皆天下名川，果在於滇，足相引重，亦生斯土者所宜亟考也。況我國家幅員廣大，超軼隆古，皇上嘗命詞臣修《皇輿表》、《一統志》諸書，近復特遣使臣分行天下，測山水之高深，量道里之遠近，勒爲《方輿路程》一書。九重加意如此，而儒生敢不旁稽博覽，以資援據之萬一乎？¹⁵⁸

《方輿路程》全稱爲《欽定方輿路程考略》，乃汪士鋐(1658-1723)等奉聖祖敕命編纂，成書年代不詳¹⁵⁹。《清史稿》曰：「雲南，〈禹貢〉梁州徼外地。」¹⁶⁰是以不見載於〈禹貢〉。但是〈禹貢〉所談及的名川大江也出現流經雲南境內，像是長江、金沙江，乃至無法確指的黑水，在雲南境內大抵皆呈北至南流向。題目一開始就問考生「滇南古梁州之裔，其山川不見稱於〈禹貢〉，何歟」，提示考生要從聖祖統一疆域的角度切入，並且要求詳考長江、黑水與金沙江三者的關係，所依據者，是經實地測量的《方輿路程》。李紱引導考生留意雲南自古不見於〈禹貢〉，而今納入清廷行政版圖的局勢。換句話說，透過策問宣示雲南已爲中央所管轄，也宣揚「九重」之德遠邁〈禹貢〉¹⁶¹。

¹⁵⁸ [清]李紱：《穆堂初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清代詩文集彙編》，第232-233冊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奉國堂刻本），卷44〈雲南鄉試策問五首〉，頁8a-b。

¹⁵⁹ 趙爾巽等：《清史稿》，卷146〈藝文〉，頁4287「地理類」條。《欽定方輿路程考略》今收在天津圖書館編：《中國古籍珍本叢刊·天津圖書館卷》（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影印清康熙內府刻本）的第二十一—二十二冊。觀其內容，是以京師爲中心，輻射到各地的路程距離，間亦收錄歷代文人題詩、題記，以及聖祖巡狩各地山川、古蹟所題的詩詞。

¹⁶⁰ 趙爾巽等：《清史稿》，卷74〈雲南〉，頁2321「雲南」條。

¹⁶¹ 由於文獻不足，當時考生如何回答無法具體得知，但是李紱於策問之後，曰：「余典試雲南，以南、北二金沙江發策問士，亦莫有能言其原委者。」於是自己根據《方輿路程》一書，撰寫〈江源攷〉、〈黑水攷〉等文。〈黑水攷〉的論點與聖祖相同，以潞江爲黑水。至於江源，李紱認爲「以源之遠論，當主金沙江；以源之大論，當主鴉礮江，然不如金沙爲確」，「若岷江，則斷斷不得指爲江源也」。論點雖然與聖祖稍異，但是仍不妨礙其盛

疆域的成果，在高宗仍持續發揮。《一統志》終聖祖畢生之力，未能完成，及至高宗接續《一統志》之纂修時，則宣揚聖祖考黃河之源的功績，其曰：

由貴德堡東流四百餘里，積石關入河州界為中國黃河，自巴顏喀喇山東之阿爾坦河發源，流至貴德堡，（迴）〔迴〕環屈曲，通計二千三百餘里；自星宿海至京師，共七千六百餘里。本朝威德遠布，幅員廣大，邊徼荒服，皆隸板圖，我聖祖仁皇帝屢遣使臣，往窮河源，測量地度，繪入輿圖。凡河源（在）〔左〕右，一山一水，與黃河之形勢曲折，道里遠近，靡不悉載，較之元人所志，又加詳焉。¹⁶²

又，記載黑水曰：

按舊輿圖西番之西，大流沙之南，湧出一澤，名曰嘉湖，南流為潞江。以今考之，嘉湖即喀喇池也，蒙古名黑為喀喇，水為烏蘇。此水大于瀾滄、葉榆，而色深黑，故名。……以此為〈禹貢〉之黑水，則名稱猶舊，較之指瀾滄、葉榆為黑水者，猶為畧有依據也。¹⁶³

以上兩段記載，大抵本於聖祖考辨黃河與黑水之語，《一統志》載入毫不意外。要留意者，上文所述聖祖藉由考辨江河來顯示對疆域的控制力，這是大一統的歷史建構，非歷史事實，因為青海與西藏在康熙朝時未納入版圖¹⁶⁴。據今人郭成康考察，清朝前期的「中國觀」，是逐步從順治朝以中原內地為主要地區的中國觀，到康、雍兩朝以中國為主，向外推展，使四夷歸順，迄於乾隆朝則將四夷納入版圖，使之「中國化」的中國觀¹⁶⁵。大一統的實踐，至乾隆朝可謂達到高峰。

讚「聖人嘉惠天下之盛心，使通經學古之士，不出戶而知天下也」。以上見李紱：〈江源攷〉、〈黑水攷〉，《穆堂初稿》，卷19，頁10a-12b、16a-21a。蓋論述的根據不同，結論亦異。其實對大江名川之源的論述，是否符合聖祖的認定絕非重點，透過討論江源、河源，以證清朝大一統的盛世，才是共同用心所在。

¹⁶² 和坤等：《欽定大清一統志》，卷412〈青海〉，頁27b「黃河」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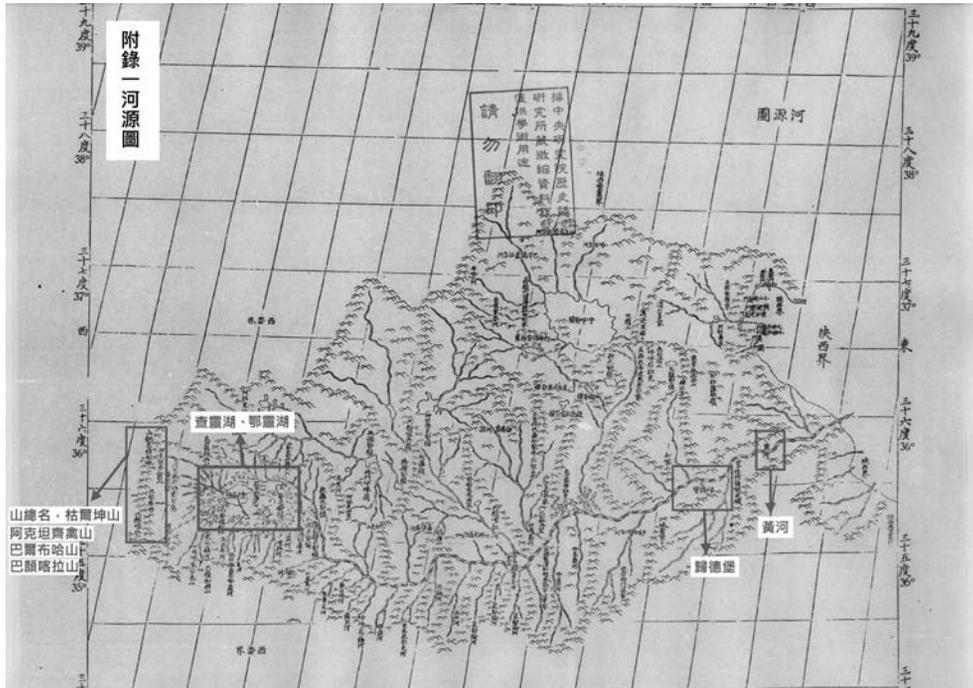
¹⁶³ 同前註，卷413〈西藏〉，頁20b「潞江」條。

¹⁶⁴ 《一統志》論青海沿革，曰：「國初有厄魯特顧實汗者，自西北侵有其地，遣使修貢，詔封遵文，行義敏慧，顧實汗後，自分其地為左右二境，部落散處其間，謂之西海諸台吉，為四厄魯特之一。康熙三十六年，既平噶爾丹台吉，札什巴圖爾等咸來朝內附，封爵世襲。」論西藏沿革，曰：「康熙三十二年，封第巴為土伯特國王，賜金印。時達賴喇嘛示寂，第巴匿不以聞，潛與額魯特噶爾丹相為表裏。……五十三年，遣大兵進藏討平之，復護送喇嘛歸布達拉廟，掌興法教，番眾皆向風附化。」見同前註，卷412〈青海〉，頁3b-4b；卷413〈西藏〉，頁3a-b。康熙朝的西域，在政策上是「來朝內附」、「向風附化」，並未在當地畫行政區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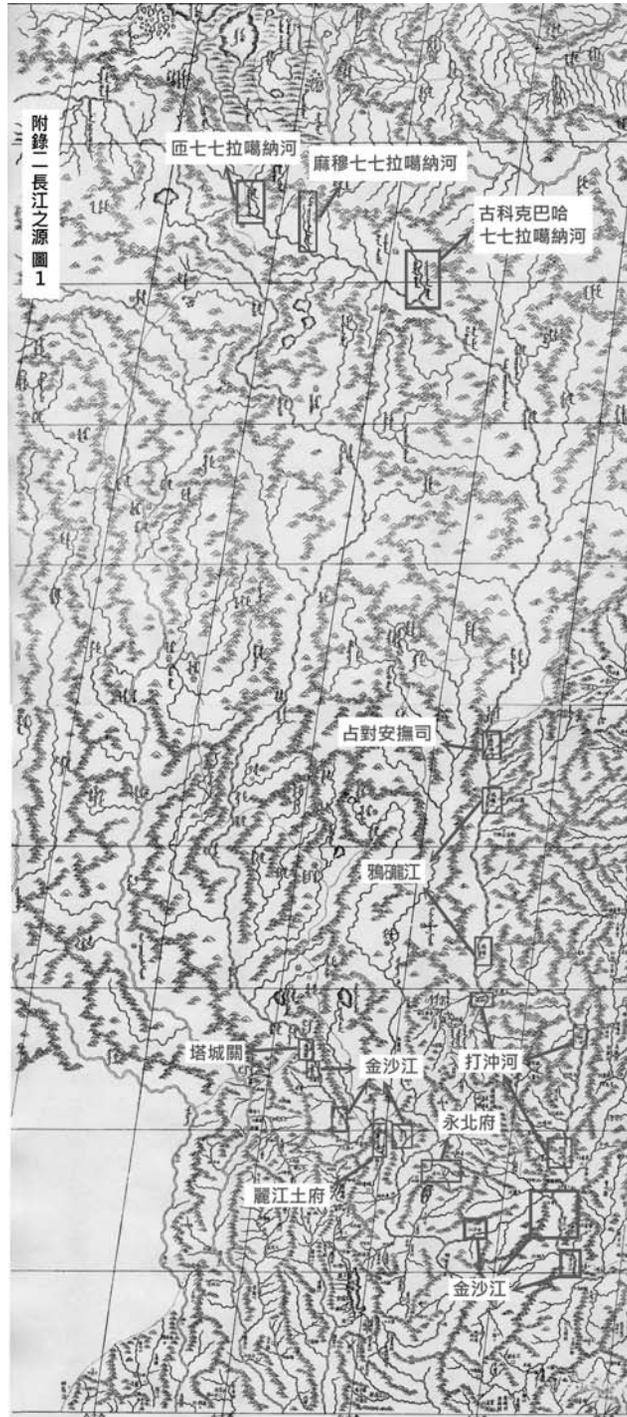
¹⁶⁵ 郭成康：〈清朝皇帝的中國觀〉，收入劉鳳云等編：《清朝的國家認同：新清史研究與爭

《一統志》載聖祖考論河水，有高宗宣揚其祖功業的用意，同時突顯出高宗藉以表達自己延續聖祖大一統的理念；而大一統的理念不再只是康熙朝政策上的「來朝內附」，而是乾隆朝「皆隸版圖」之掌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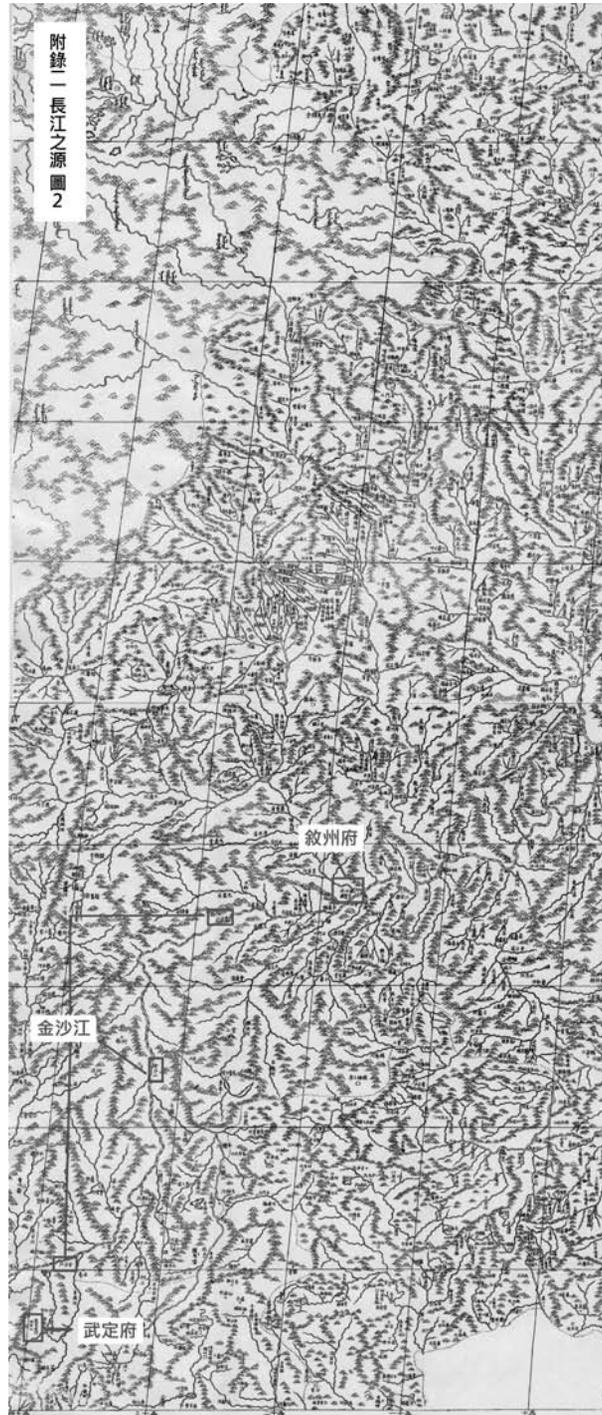
聖祖考辨〈禹貢〉山水，是建立在〈皇輿全覽圖〉上，結論自然要比前儒更接近確切的地理位置，其用心主要是藉〈禹貢〉來凸顯自己的治統與道統，遠紹堯、舜、禹聖王，證明大一統的實踐。此理想在高宗與士人身上，仍不斷延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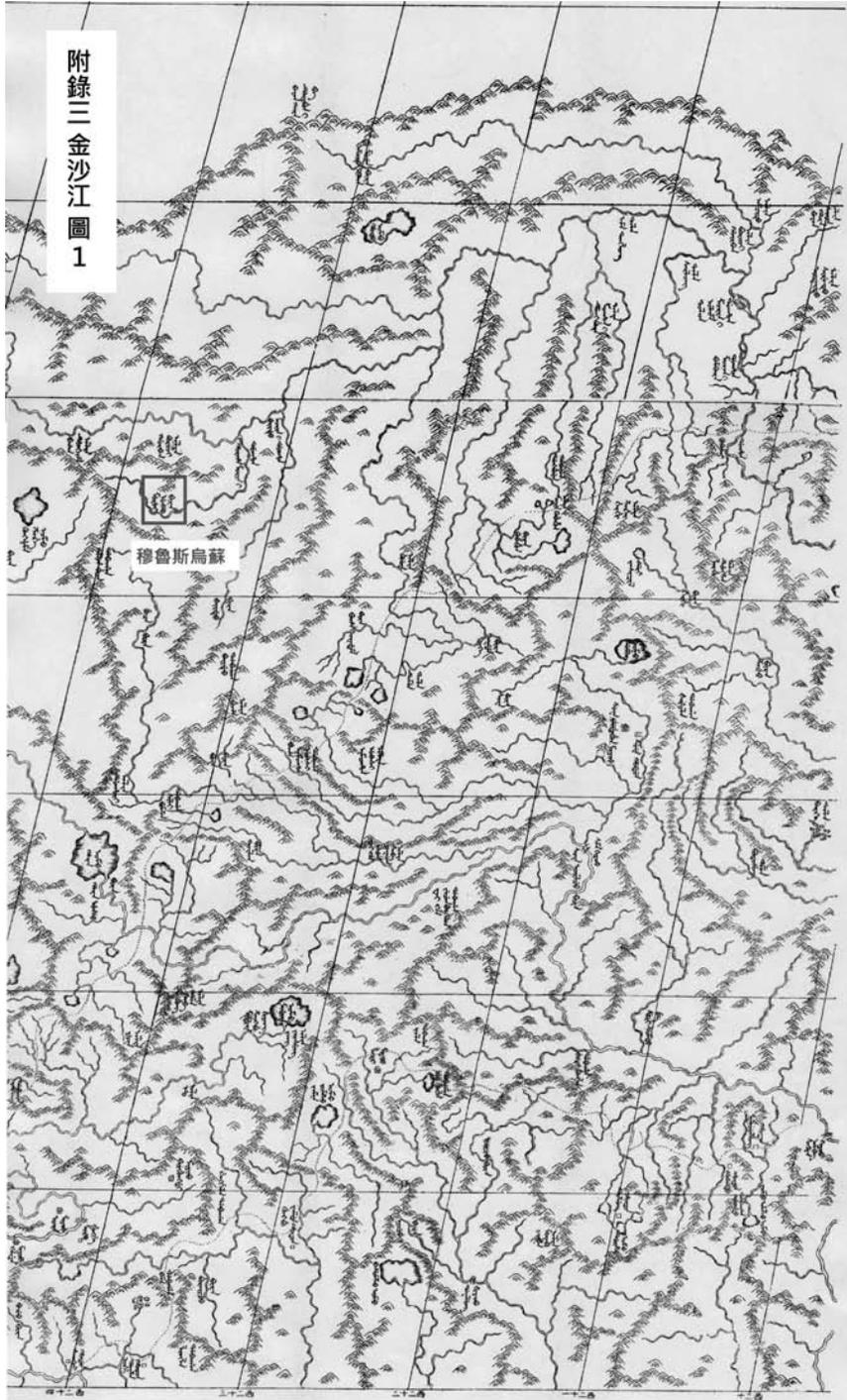
附錄一 河源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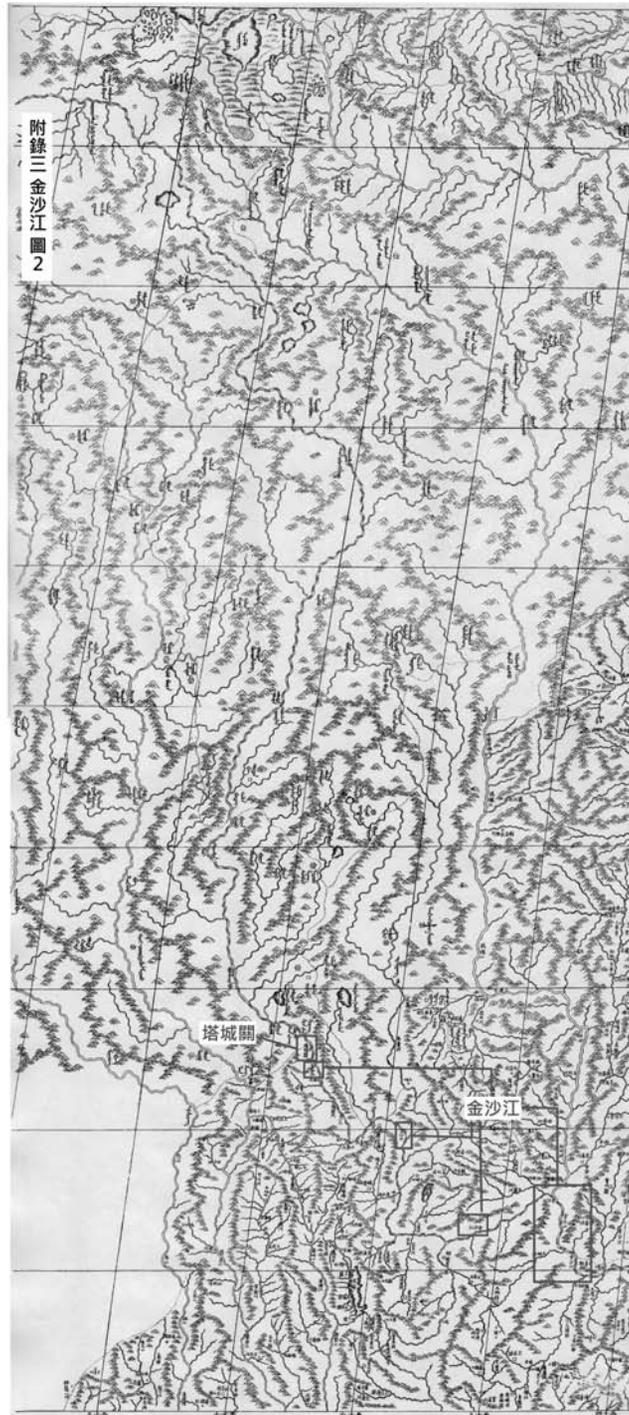
附錄二 長江之源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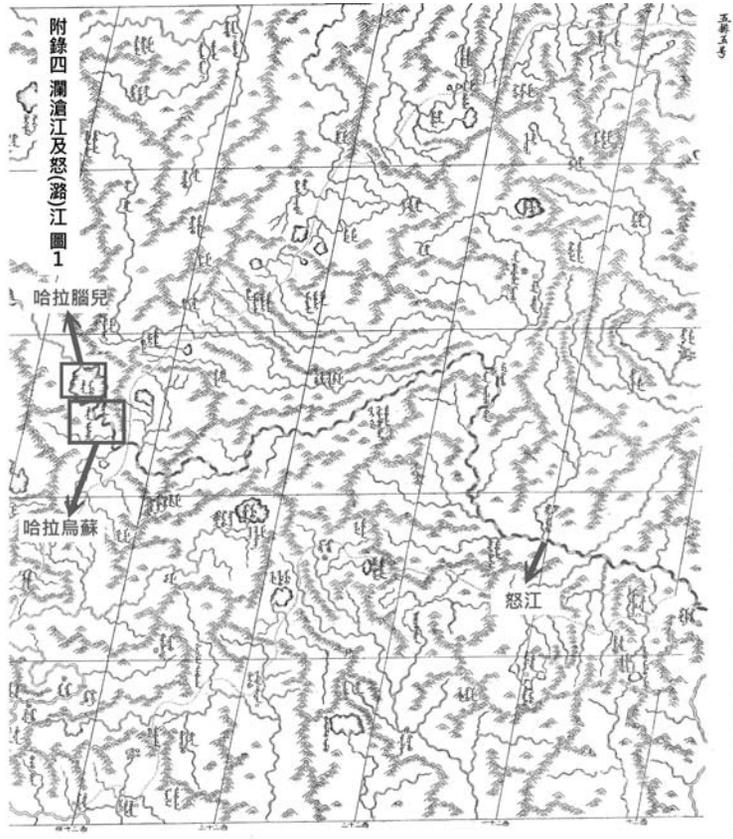
附錄二 長江之源圖 2



附錄三 金沙江圖 1



附錄三 金沙江圖 2



附錄四 瀾滄江及怒（潞）江圖 1



附錄四 瀾滄江及怒（潞）江圖 2



附錄四 瀾滄江及怒(潞)江圖 3

山川原委，皆可案圖以稽

——清聖祖考辨〈禹貢〉山川示例

簡承禾

本文主要分為兩方面處理清聖祖考辨〈禹貢〉的問題。(1) 聖祖藉由〈皇輿全覽圖〉詳論〈禹貢〉山川名號，故本文比對聖祖的言論與〈皇輿全覽圖〉，逐一梳理其所指的黃河之源、長江之源及黑水、三危。(2) 指出聖祖考論〈禹貢〉的意義，在彰顯其畢生文治武功，有實踐大一統及遠紹上古聖王的心理。而且此心理，持續在清高宗及士人身上發酵。

《尚書》是帝王政治之書，〈禹貢〉更寓有大一統的意義。但是西域邊陲之地，是歷代政權所不及處。清聖祖積極經營域外，最後繪入〈皇輿全覽圖〉，因而能按圖索驥，詳論彼雖載之〈禹貢〉，卻無法實際控有的河流發源處。本文之撰寫，揭示帝王討論經學，有強烈的現實感，並且具有企圖心，非僅是案上考索。

關鍵詞：清聖祖 大一統 〈禹貢〉 〈皇輿全覽圖〉

On the *Kangxi huangyu quanlantu*: How Emperor Kangxi Used the “Yu Gong” Chapter of the *Shangshu* for Purposes of Self-glorification

CHIEN Cheng-ho

This paper considers Emperor Kangxi’s discussion of the “Yu Gong” chapter of the *Shangshu* from two points of view. First, it notes that in Kangxi’s famous atlas, the *Kangxi huangyu quanlantu*, there is some discussion of the mountains and rivers mentioned in the “Yu Gong” chapter. Similar discussions are also found in other works by Kangxi. The paper provides a careful comparison of Kangxi’s observations on the origins of the Yellow and Yangtze rivers, as well his remarks on the Amur river and the Sanwei mountain, with what we find in the “Yu Gong” chapter. Second, from the preceding discussion,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Kangxi was interested not so much in cartography and the study of ancient texts, as in emphasizing his own great personal achievements. Indeed, for him, the study of the past was a means of self-glorification. He emphasizes that under him, the Qing dynasty was able to accomplish what no other dynasty was able to do—gain control over all the territories mentioned in the “Yu Gong.” This attitude would have an influence on Emperor Qianlong and on later literati.

Keywords: Kangxi grand unification “Yu Gong” the *Kangxi huangyu quanlantu*

徵引書目

- 公羊壽傳，何休解詁，徐彥疏：《公羊傳》，收入《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2007年。
- 孔安國注，孔穎達疏：《尚書正義》，收入《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2007年。
- 方豪：《中西交通史》，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3年。
- 王天順：《河套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 王澈編選：〈康熙十七年《南書房記注》〉，《歷史檔案》1995年第3期，頁3-19。
- _____：〈康熙十八年《南書房記注》〉，《歷史檔案》1996年第2期，頁3-19。
- _____：〈康熙十九年《南書房記注》（一）〉，《歷史檔案》1996年第3期，頁1-8。
- 司馬遷著，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臺北：藝文印書館，1972年。
- 永瑛等：《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田曉岫：〈西藏載入中國版圖始見於《夏書·禹貢》〉，《中央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5期，頁94-100。
- 朱鶴齡：《禹貢長箋》，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吳伯姬：《康雍乾三帝與西學東漸》，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
- 宋濂等：《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
- 李振興：〈禹貢山水〉，《孔孟學報》第48期，1984年9月，頁57-110。
- 李泰等著，賀次君輯校：《括地志輯校》，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 李紱：《穆堂初稿》，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23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汪士鋐等：《欽定方輿路程考略》，收入天津圖書館編：《中國古籍珍本叢刊·天津圖書館卷》，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年。
- 汪前進、劉若芳整理：《清廷三大實測全圖集：滿漢對照》，北京：外文出版社，2007年。
- 和坤等：《欽定大清一統志》，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74-48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屈萬里：《尚書集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年。
- 林天人：〈黃河遠上白雲間——關於河源認識之探討〉，收入《空間新思維——歷史與圖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國立故宮博物院，2008年11月6-7日。
- 南懷仁：《韃靼旅行記》，收入白晉著，徐志敏、路洋譯：《老老外眼中的康熙大帝》，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08年。
- 胡宣慶：《皇朝輿地水道源流》，收入石光明等主編：《中華山水志叢刊·水志卷》，北京線裝書局，2004年。
- 胡渭著，鄒逸麟整理：《禹貢錐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 范成大：《吳船錄》，收入《知不足齋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

- 范曄著，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
- 茅瑞徵：《禹貢匯疏》，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5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 庫勒納等：《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9年。
- 庫勒納等奉敕編：《日講書經解義》，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
- 徐弘祖著，褚紹唐等整理：《徐霞客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徐志敏等譯：《老老外眼中的康熙大帝》，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08年。
- 班固著，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 馬子木：《清代大學士傳稿(1636—1795)》，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13年。
- 馬齊等監修：《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臺北：華聯出版事業公司，1964年。
- 高師第：《禹貢研究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 張居正：《書經直解》，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
- 張英：《書經衷論》，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張誠著，陳霞飛譯：《張誠日記》，北京：商務印書館，1973年。
- 清世宗敕編：《聖祖仁皇帝聖訓》，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1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清高宗敕編：《清朝通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
- 清聖祖：《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98-129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郭成康：〈清朝皇帝的中國觀〉，收入劉鳳云等編：《清朝的國家認同：新清史研究與爭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
- 郭璞注，邢昺疏：《爾雅注疏》，收入《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2007年。
- _____，畢沅校：《山海經》，收入《二十二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 陳東：《清代經筵制度研究》，濟南：山東大學博士論文，2006年。
- 陳詩雯：《十七世紀中西知識體系的相遇——以康熙皇帝為中心的探討》，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10年。
- 陸游：《渭南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上海：上海書店，1989年。
- 傅恆等：《欽定西域同文志》，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3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揆敘等奉敕編：《皇輿表》，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出版年不詳。
- 程大昌：《禹貢山川地理圖》，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馮寶琳：〈康熙皇輿全覽圖的測繪考略〉，《故宮博物院院刊》1985年第1期，頁23-31、35。
- 鄒愛蓮主編：《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 靳輔：《治河方略》，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
- 趙爾巽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

- 趙寰熙：〈皇輿全覽圖各版本對比研究〉，《滿族研究》2009年第4期，頁56-60。
- 福克司：《康熙時代耶穌會教士地圖集》（微卷），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
- 劉起鈞：〈三危、弱水、黑水考〉，《尚書研究要論》，濟南：齊魯書社，2007年。
- _____：《尚書學史》訂補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
- 蔡沈：《朱文公訂正門人蔡九峯書集傳》，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
- 蔣廷錫：《尚書地理今釋》，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鄭玄注，王應麟輯，孔廣森增訂：《尚書鄭注》，收入古風主編：《經學輯佚文獻彙編》，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年。
- 賴振寅：〈讀宗泐望河源并序〉，《文史知識》2006年第2期，頁38-40。
- 謝國興主編，林天人編撰：《方輿搜覽——大英圖書館所藏中文歷史地圖》，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5年。
- _____等總策劃，_____：《皇輿搜覽——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明清輿圖》，臺北：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2013年。
- 簡承禾：《康熙日講書經解義研究》，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2年。
- 譚其驥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清時期》，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87年。
- 顧一凡：〈同源異軌：日講書經解義與書經衷論考析〉，《北京社會科學》2021年第1期，頁55-64。
-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臺北：新興書局，1972年。
- 酈道元注，陳橋驛校證：《水經注校證》，北京：中華書書，2007年。
- 船越昭生：《鎖國日本にきた康熙圖の地理學史的研究》，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1986年。
- Fuchs, Walter. *Der Jesuiten-Atlas Der Kanghsi-Zeit: Seine Nstehungsgeschichte nebst Namenindices für die Karten der Mandjuri, Mongolei, Ostturkestan und Tibet mit Wiedergabe der Jesuitenkarten in Originalgröße*. Peking: Fu-Jen Universität, 1943.